

台灣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個台灣活動家的視角*

曾建元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

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政治動力，這意味著反對中華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中國民主運動則在價值上無法迴避民族自決的問題。台灣民族主義曾經困惑於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但台灣的民主化，使他們願意從普世價值的立場支持中國民主化，也希望透過合作與互動，幫助中國民主運動重新認識台灣。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也在與台灣的接觸中，學習到尊重多元文化主義，從而反省他們面對中國少數民族自由運動的立場和政治主張。本文將從作者的親身經歷與近身觀察，探討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海外民主運動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互動，如何進一步為台灣民主運動和台灣獨立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的關係重新定位，進而為日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創造新的想像。

關鍵詞：中國民主化、台灣民主化、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兩岸關係、民族認同、普世價值

* 本文原題〈重新接近：中國與臺灣〉(Reapproaching China and Taiwan)，為澳洲西澳大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教授陳杰主持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計畫 Taiwan and the Cau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 and Actual Support 的部分中文初稿，宣讀於國立金門大學和平研究中心暨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0 日下午假金門縣金寧鄉國立金門大學圖資大樓陳開蓉會議廳主辦之 2022 年第三屆「金門和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岸關係的重構與風險」場次，感謝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何思慎的評論。

紀念洪哲勝（1939-2020）

壹、中國與台灣：民主與民族主義的初生

奧地利學者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關於民主的最低限度（minimalist）的定義，在他被稱為競爭性菁英式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或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的理論中，熊彼得認為，政治基本上僅為人民選擇決策者的一種特殊的程序，只要政治制度允許期望擔任決策者的菁英團體透過公平、公開的競爭，來爭取人民的選票，而人民有權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做此選擇，就是民主。美國學者道爾（Robert A. Dahl）則在《多元民主：參與和反對》（*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進一步修正了熊彼得的理論，認為在精英民主之外，也應當要認識到公眾參與和多元的公民社會自治的重要性，道爾提醒程序性民主的前提必須是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價值體系，人民在選舉投票中從事政治選擇、政治菁英爭取選票的政治競爭行動，都必須基於自由意志，這才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民主的前提，必須是自由權與其制度性的保障；民主則更意味著主權在民，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民主（Lamounier, 2002: 10）。而國家性（stateness）問題，即主權國家疆界的確立，亦即國家主權者／人民範圍的界定，是實現民主國家統治與被統治是否同一的重要工程，進而聯繫到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與民族打造（nation-building），從主觀的集體心理角度來看，國家打造就是民族認同的課題（Linz & Stepan, 1996: 16-17）。

民族認同涉及到凝聚人民集體認同的價值基礎。現代民主之民族認同的理性基礎，乃建立在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即以作為政治權利主體的公民身分作為民族認同的起點，和傳統國家以文化血緣的感性基礎自然形成的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大異其趣（Breton, 1996: 348）。傳統中國是以中華文化認同發展出來的世界政治秩序，中華世界的政治文化則以儒家的孝道倫理為核心，其精神在於將家庭倫理關係擴

大為天下統治秩序，家庭倫理關係中道德權威的父親，在天下秩序中則被擺置以皇帝／天子（曾建元，2020：236）。皇帝因其君權神授的天子神格性，加上道德和政治上的權威地位，於是擁有了不容臣民挑戰的絕對權力，只有當天命轉移，改朝換代才有其正當性，在革命的過程中，民意只是天意的徵兆，並不具有政治選擇的獨立權力。

理論體系源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民主政治，首先將上帝耶和華和教會的地位絕對化，再以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重建君王和人民的關係，演繹出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作為世俗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契約論的精神在於等價的自由交換，國家以對於人民關於保障生命、財產、自由、幸福的政治承諾為對價，交換人民的國民義務和忠誠。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讓台灣，這是晚清以來中國與台灣以台灣海峽為國界的歷史起點。台灣仕紳和開明官員在 1895 年乙未戰爭中，自萬國公法和憲政主義汲取智慧和規劃策略，以人民自決的法理締造台灣民主國，將台灣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正當性奠基在台灣人民，嘗試區別對於台灣的政治認同和對於中國清朝的文化認同，更以權力分立制衡的共和原理設計憲政體制，推舉議員，建立議院，可以說 3,000 年中國封建政治曠古未有的真正宇宙大爆炸（曾建元、楊明勳，2015：76-81）。

甲午和乙未戰爭，為日後世界和東亞格局下的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帶來地殼變動般的深遠影響，台灣收入大日本帝國版圖，卻也因此直接自日本『明治憲法』吸收了憲政主義的養分，從而在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和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推動經驗與歷程中，鍛鍊出台灣人出頭天的政治追求和對於憲政民主與地方自治的認識和堅定信念。梁啟超便一語點醒台灣仕紳領袖林獻堂，中國無力使台灣回歸，所以台灣人只能學習愛爾蘭，從日本的憲法秩序中去尋找台灣人權和自治的法理依據，在台灣の自治中等待解放的機會（許世楷，2006：245-46）。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經驗，使台灣人學會了區別公民身分和民族歸屬、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另一方面，流亡中國客家原鄉の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懷抱強中復台的心志，投入新學教育啓蒙民智和培育革命人才，而更在辛亥革命之日，以廣東省參議會副議長身分領導廣東省起義，參與創建中華民國（曾

建元、楊明勳，2015：94）。中華民國的建立，終結帝制，逼迫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更是中國政治史上翻天覆地之舉，蓋這是以國民主權和憲政主義等理念為立國精神建立的共和國，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中山，便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架構，引進舉世三大思潮，為中國建構現代化的國家藍圖，而當中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除了孫中山充溢憲政主義和民主共和精神的民權主義相關主張之外，「中華民族」概念的建構，則是歷經一段曲折的過程，在公民民族主義和虛構的族群民族主義之間徘徊。

原本，「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梁啟超的發明。在保皇黨和革命黨鬥爭和論戰的年代，他和孫中山都有過排滿的漢民族主義主張，但梁啟超更早認識到「滿洲已盡同化於中國」的現象，所以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的主張；這是以大清帝國統治地區為疆界，轉化大清臣民對滿洲皇帝的效忠為對中國民族認同的憲政工程，其政策工具為憲政主義，即透過憲政主義的制度安排，讓各族人民基於對憲政制度的認同而留在中國。孫中山原本主張漢族復國，被梁啟超批評為小民族主義（陳沛郎，2005：112）。民國建立後，孫中山雖接納了五族共和的主張，但其核心理念，還是漢族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掀起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下，孫中山又基於對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憂慮，改而主張以漢族文化為中心，同化其他各族而成為中華民族，而以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決作為維護中國主權的國際法武器。孫中山很清楚中華民族是人為政治的建構，所以他演講民族主義時，便說明了民族有主、客觀的構成要素，主觀要素就是民族意識，其形塑有其客觀的條件和價值內涵（鄭欽仁，2019：127-34）。令人遺憾的是，孫中山將民族意識寄託於所謂的固有道德和知能，其身後中國國民黨的正統意識形態戴季陶主義片面地誇大孫中山與中國道統的繼承關係，把中華民族主義又拉回到族群民族主義，而且是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同化主義（曾建元，2002：112）。

20 世紀初的中國與台灣，在政治文化和國家觀出現了不同典範的發展，中國用國家取代了皇帝，用虛構的中華民族包裝大漢族主義，古老的帝國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形式下以「家國」的新生命重生（許紀霖，

2018)。另一方面，台灣則在憲政主義中爭取民族解放，主權國家和民族自決成為台灣人擺脫殖民地地位的工具，1928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的風潮中，在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提出反殖民主義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許世楷，2006：436-39）。台灣民主國和台灣共和國，都是台灣人抵抗日本殖民、找到集體身分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工具，社會契約論下的國家工具論，在台灣人虛無和分歧的國家觀中獲得最虔誠的信仰。

貳、當代中國與台灣：民主與民族主義的和聲與變奏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巴黎和會關於德國在華利權轉讓與日本的安排，使中國人民全體情緒備受打擊，五四新文化運動於是爆發，救亡圖存的危機感，使中國為共產主義打開了大門。中國共產黨成立，進一步加入中國國民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支援中國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部分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以改進國民黨，如以職業革命家黨、黨軍和民主集中制建立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取法無產階級專政論重建建國方略中的軍政與訓政，以階級觀點反省中國的工農群眾問題，進而從事社會啟蒙，從事社會改造，並將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放置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論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格局下來理解，這都使三民主義理論的內涵更上一層樓，而聯繫到當世全球的三大思潮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因為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決策，國民黨的海陸軍大元帥府及其後的國民政府先後獲得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第三共產國際的軍事援助，國民黨更成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國民革命軍乃得以東征北伐統一中國，但這一武力統一的強勢作為，遺留下至少兩個問題：

第一，辛亥革命以來初萌的議會政治和聯省自治成果，全部歸零。蘇聯的民主集中制憲政體制被視為新式民主，即人民主權集中由一代議機構代表行使。孫中山曖昧不明的國民大會概念，被全面理解為「國民代表大會」。第二，國民黨迷信暴力解決政治分歧，實施白色恐怖進行清黨，而共產黨也以暴力進行反制和革命，接著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中斷了制憲工作，

也失去了在和平的環境中孕育三民主義共和國政治生態、政治文化和公民社會的契機。

中華民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是黨國體制，政治意識型態都帶有列寧主義的基因。西安事變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組為陝甘寧邊區，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1940 年 1 月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 1 次代表大會上講演〈新民主主義〉，儼如正統三民主義的憲政論述經典文本。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民主主義又可分為舊民主和新民主，前者為資產階級民主，後者則為人民民主、平民政治。毛澤東和『五五憲草』都肯定民主集中制政體，贊同中國由全國、省、縣、區到鄉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統治，並由各級人大選舉政府，而認為這種制度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鬥爭，最能反映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次月，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演說〈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還特別引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的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新民主主義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薛忠義，2004）。新民主主義的提出，意味著毛澤東和中共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忠實追隨者。

抗戰勝利，中華民國代表聯合國接收台灣，同時光復台灣，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推動和平建國和制憲，參與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的起草，確立普世人權價值體系。台灣人和中國人都歡欣於成為新中國的主人，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國民政府統治區，兩岸人民共同體驗了自由投票和政黨競爭。台灣雖然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正因台灣人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次等公民，因此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和中國認同反而十分堅定，1945 年台灣光復後，迎來的中國卻嚴重衝擊著台灣人的感情，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於 1946 年 4 月 29 日於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中公開指稱台灣人在日本皇民化下被完全奴化，引起台灣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抗議，認為是對台灣人的侮辱（李筱峰，2020）。范壽康的表現，乃成為台灣人對於中國人

傲慢自大性格的典型負面印象。國共內戰復起，國民政府鎮壓台灣二二八起義的同時，國軍也正攻進延安。

兩個黨國都迷信軍事和暴力，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國軍趕出中國大陸，另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台灣共產黨左翼傳統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參與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民國則實施動員戡亂和戒嚴，兵敗退守台灣，國民黨實施黨的改造，重建黨國體制，展開恐怖統治。台灣與中國大陸再次分離。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協防台灣，東亞冷戰結構成形，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展開中國代表權鬥爭。中華民國在台灣爲了政治號召，以『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建構憲法秩序，但又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重要憲法規範，特別是爲了維護中國國家主權象徵，把中國國家主權寄託在第一屆中央民意機關，也使國民黨得以因國會不改選而壟斷政權。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前朝鎮壓肅清反革命後，也終於對民主黨派和黨內展開反右派鬥爭，確立共產黨一黨領導的黨國專政體制，部分台灣人寄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再解放的願望終於破滅。

1955 年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運動在日本成立國民議會，這代表著流亡海外的台灣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在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陣營中的正式插旗起跑。1966 年由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公開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兼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法律顧問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於 1964 年在台灣共同秘密起草的，代表著台灣國內的本土菁英在台灣建立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反抗意識覺醒；彭明敏等明白指出，在美國的限制下，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已不可能，反攻大陸已成爲國民黨維持黨國獨裁的藉口，彭明敏等也不認爲台灣可以永遠代表中國，台灣人民應當擺脫與兩個中國的糾葛，自救建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1971 年 10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這代表台灣國際地位雪崩的開始。爲了挽救外部正當性的衰退，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由蔣經國主持臨時會，決議修改『臨時條款』開放定期性增額中央民代選舉，爭取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支持，這是中華民國統治正當性向台灣本土轉化的起點。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

長，主導吹台青政策，大量晉用台灣人入黨和入閣，而國會開放席次定期改選，則為在野人士創造了結盟的機會，「黨外」於焉出現。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意味著擁有台灣主權，基於『聯合國憲章』內政不干涉原則，台灣主權一旦在國際法上有被認定為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就會使台灣暴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侵略的危險當中，而對抗中國聲索台灣主權的最直接作法，就是在法理上脫離中國。1972 年，前政協秘書長、中國民主黨運動領袖雷震即向蔣經國提出〈救亡圖存獻議〉，建議更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1977 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台獨主張首度在國內公開提出挑戰當局。

台灣存亡的危機持續探底，1979 年元旦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4*），改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砲擊金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改而宣稱將致力於和平統一台灣。台美斷交卻成為台灣政治改革的轉捩點，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提供台美關係特殊安排，而在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遊說下，美國將維護台灣人權作為對台灣提供軍事援助與安全保障的前提。1980 年 6 月，蔣經國宣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放棄軍事反攻大陸。1982 年美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下簽訂關於減少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2*），同時對台灣提出六項保證，包括不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意即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蔣經國則向美國出示其政治民主化、政府本土化、保障台灣經濟繁榮和向中國大陸開放民間往來的四點政治改革方案。

美國將對華政策放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架構下來看，而依照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的大戰略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國際安全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國，也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因此在一個中國政策下，乃不得不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7 年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建黨國體制過渡期間，於 1978 年初有北京之春運

動的出現，鄧小平因勢利導，促成 12 月中共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全體會議決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從而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和解氣候，美國乃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藉此交換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8 年 12 月 16 日起停止炮擊金門，中華人民共和國遂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 1979 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告推動和平統一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的氛圍中，鄧小平在 1980 年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說要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與國民黨在台灣鎮壓黨外的美麗島事件，兩岸在政治發展上形成了競爭與對比。

但北京之春驟然蕭索，1978 年 12 月 5 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大字報，1979 年 3 月 30 日，鄧小平在中共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秋天魏京生受審，民主牆關閉；198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新憲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憲法第一基本原則。在此同時，台灣黨外運動則在自由選舉中證明獲得台灣人民的普遍同情與堅定支持，蔣經國終於讓步，1986 年 9 月黨外組黨，黨名民主進步黨，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1987 年 7 月，台灣解除戒嚴，全面自由化。1987 年 10 月，中共第 13 次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趙紫陽提交《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政治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宣示加強建設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黨政分離，社會協商，揭橥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旗。1989 年 4 月 15 日，北京中上各校學生以追悼 1986 年丙寅學潮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為由集結天安門廣場，要求政治改革。四一五學潮於 6 月 4 日遭軍事鎮壓，同情學運的趙紫陽遭到罷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遭到重挫。

1990 年 3 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借力使力，於第一屆國大第八次會議當選總統，承諾學運四大訴求，終止動員戡亂，召開國是會議，展開憲政改革。1991 年 2 月，李登輝任務編組設立於總統府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主張中國統一，而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最終則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依據兩

岸人民意願，研訂憲政體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1991 年 5 月，第一屆國大廢止『臨時條款』，通過『憲法增修條文』，台灣全面走向民主化。兩岸政治體制和立國精神，從此天南地北，越走越遠，『國家統一綱領』設計的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統一條件無以達成『國家統一綱領』成為「國家不統一綱領」。

『憲法增修條文』定位兩岸為國家統一前狀態，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即不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而是事實上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乃成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1991 年 8 月，民進黨籌開台灣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10 月 13 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修訂黨綱，依『台灣憲法草案』主張經公民投票議決建立台灣共和國。台灣獨立建國成為民進黨政治主張，意味著這一主張受到民進黨支持者和潛在支持者相當程度的歡迎，也反映了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台灣民意政治上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遍失望情緒。1993 年 12 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黨縣市長候選人造勢大會上提出台灣生命共同體理念（曾建元，2002：129-48）。

參、台灣民主化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中國之春運動開出海外中國民主運動

197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文革後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其中留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王炳章，與同校台灣裔學生寧勤勤結縭，於 1982 年 9 月獲得實驗醫學博士後，11 月在美國紐約發表《爲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志繼孫中山，揭竿起義，宣布投身中國民主運動，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由會長薛偉（黃仕中、王元泰）聲明響應（劉勝驥，1984：83）。王炳章棄醫從運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因爲以他的資歷與聲望，曾有返國出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的傳聞（陳維健，2022）；但他卻放棄了似錦前程，選擇走一條荊棘密布的道路。

給予王炳章最早支持的海外中國反共力量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是1981年在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曾廣順）資助下在紐約創立者。薛偉於1980年自費留美，他出身反革命右派家庭，父親王漢樞曾任民國重慶市代理市長，母親盧蘊蘭為四川省立重慶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均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迫害，因而帶著國仇家恨離開中國（王平宇，2006）；薛偉在海工會資助下與前吉林省政府參議段克文共同以復刊1979年由魏京生在北京創辦的民刊《探索》雜誌名義，在紐約創辦《探索》月刊，由段克文任社長增薛偉則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林同，1991）。

1982年12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隔年3月成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5月王炳章（1983）在《中國之春》第3期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中倡議「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五項政治主張：「一、廢除一黨專制；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王炳章主張制定新憲法，也期待新憲法能以聯邦制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惟其並未就兩岸如何統一的程序問題提出主張（陳力、蘆葦，1994）。12月27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王炳章（1984）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直言，台灣政府不是民主政體，但認為國共鬥爭可以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空隙，這一新的政治力量苟能與中國人民廣泛參與中國的統一，就能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建立提供機會。

該次會議台灣人有具有國防部情報局背景的林樵清、以及留學生沙林（姜新立）、楊雲（雨亭）等與會，組織正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王炳章當選首任主席，這是當代中國大陸第一個海外民運隊伍（劉勝驥，1984：87）。林樵清當選總部常務委員，沙林與楊雲則當選總部委員，是最早投入當代海外中國民運的台灣人。楊雲受任為民聯舊金山分部主席，並被任命處理對台事務。1985年楊雲和同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柏克來分校留學的台灣人郭台鑑（郭平），以及孫魯正、梁冬、江文、林劍明等協助黃雨川共同創立了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自1986年起每年從事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的

評選；該基金會關心的是大中華地區的民主發展，所以也希望透過評獎敦促台灣的民主化，而在 1987 年第二屆評獎中首度頒獎給台灣人，是參與民進黨組黨的第一屆資深立法委員費希平（亞衣，2003）。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的成立，引起蔣經國的注意，在總統府下成立秘密小組負責與中國之春／民聯合作工作，設立《移山專案》，由中華民主自由基金會不附條件地提供中國之春／民聯與《中國之春》雜誌資金支援；他派國防部情報局在紐約設立駐美東工作組，對外以君平公司掩護，由組長翁衍慶（翁遠書）負責聯絡王炳章，後者則設立貫中公司與君平公司對接（呂昭隆，2022）。中國之春雜誌社經理則由林樵清擔任，處理財務（鄭源，2022：2）。王炳章（2000）感到蔣經國待他如一家人，因此起初效忠中華民國，主張在民主中國建立之前，暫時沿用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歌。1983 年 5 月 19 日，國際反極權爭民主聯盟（Resistance International）世界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中國之春運動由留美學生張偉領銜代表與會。張偉在會後接受中華民國邀請訪問台灣，王炳章為杜絕外界對於民聯和台灣關係的聯想，乃開除了張偉盟員會（劉勝驥，1984：89、92）。

紐約中國民運的發展，自然也引起當地海外台獨反對運動的注意。王炳章（1998：73）在 1982 年即就台獨問題有過思考，而有「大陸不民主，台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台獨沒必要」的主張，這一主張是基於政治現實面對台獨的勸說。1983 年洪哲勝等台灣獨立聯盟盟員與王炳章和薛偉首度會面，洪哲勝對於這次會面感到失望，因為他感覺王、薛有著大國沙文主義的氣味，也不認可台灣人民擁有自決的基本權利（Chen, 2019: 77）。此後，他們在一些公共論壇仍常有機會見面互動。

1985 年，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副會長，1987 年在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支持下當選會長，她不憂讒畏譏，和洪哲勝熱心地與王炳章和薛偉互動，也引薦台灣反對運動工作者如黃再添、田台仁、林濁水、張俊宏、林義雄與他們認識、交流，使王炳章和薛偉等對於自決、人權高於主權等理念，有了來自台灣人視角的體會（薛偉，2020）。當時，楊黃美幸、洪哲勝、黃再添、田台仁等都還在台灣政府監控列管禁止返國的黑名單當中，而王、薛所屬的民聯原本都還擁有來自台灣

情報局／軍事情報局的大量資助（Chen, 2019: 77）。民進黨在 1986 年 9 月成立，或許受到與旅美民進黨人互動的影響，王炳章萌生在台灣組黨的念頭，軍情局感到不受控制，索性斷絕了對民聯的補助，僅保留對《中國之春》的出版經費支持（呂昭隆，2007）。1987 年 11 月台灣政府開放台灣人民登陸探親，兩岸民間展開交流，此際王炳章發他在中國大陸內部的組織現台灣軍情局利用發展情報網、屢遭破獲導致犧牲慘重，便不願再受制於軍情局，從而喊出「民運獨立」、嘗試「以商養運」，便辭去主席去銷售人壽保險進而從事移民代辦事業。此舉，使他受到軍情局和同志的懷疑抨擊（翁衍慶，2016：39）。

二、兩岸人士共議未來民主中國

爲了增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對台灣的認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任委員馬樹禮安排了立法委員趙少康、李勝峰等 6 人赴美各地座談，進而於 1988 年 12 月邀請第一批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 5 人：錢穎一、裴敏欣、吳牟人、徐邦泰、許成鋼訪台，國內行程由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陳寶川）規劃，遍訪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立法院、國、民兩黨等處（陳力、蘆葦，1994）。從事兩岸反對運動和關心兩岸民主化的海外華人，在兩岸開放交流之後的首度共同政治倡議行動，爲 1989 年 2 月 17 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開發表《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宣言由紐約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發起人倪育賢串連和主稿，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領銜，共有 56 人一同發起，以「海外一群關切中華民族前途的中國人」自署（倪育賢，1989）。發起的台灣海外學者中，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燃日後返國應李登輝邀請受聘爲總統府顧問和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旅美台灣學者丘宏達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旭成、張富美、及田弘茂等則在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中擔任部會首長，而黃默在東吳大學創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1989 年 1 月，民聯因胡平與王炳章分裂，爆發倒王事件內鬨，4 月 2 日擁王派另行集會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選出鄭爲民爲主任，湯光中與林樵清爲副主任，但王炳章則未加入中國民主黨（鄭源，2017；丁楚，

2009：337）。衝突的發生，和王炳章不擅於民主領導有關。四一五天安門學運爆發後，民聯在全球各地領導串聯聲援。六四之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於 7 月召開第 1 次代表大會，選出史丹福大學劉永川、耶魯大學韓聯潮為正、副主席。9 月，由六四流亡者組織的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成立，由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嚴家祺（嚴家其）擔任理事會主席、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領袖多萊特·吾爾開希任理事會副主席，理事中有美國台灣僑領黃偉成，台灣旅美電力工程師錢達任監事會主席，監事中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府學系台灣留學生羅慎平，前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總裁萬潤南則受任為秘書長，而發起人當中，尚有日後的第 3 任民陣主席杜智富是台灣旅居加拿大的通訊工程師（陳力、蘆葦，1994）。

12 月，由於民陣立場被質疑只是要平反六四、而不要求推翻中共政權，倪育賢發起組織中國自由民主黨，而以全美學自聯和民聯前盟員為骨幹，在美國維吉尼亞州黑堡（Blacksburg）召開建立反對黨協調工作會議進行組黨，組黨籌備委員中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博士生余茂春¹。1990 年 7 月，自民黨在俄亥俄州哥倫布（Columbus）召開一大，選出陳厚琦為主席，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生物化學系台灣留學生楊農（楊棋明）為副主席。不久，陳厚琦以學業為由辭職，楊農代理主席，1991 年 7 月 1 日王炳章與倪育賢繼任正、副主席（翁衍慶，2016：204-208；倪育賢，2007）。

海外中國民運界希望能有一全球統一的架構，因此 1990 年民陣二大通過澳洲張小剛提案，尋求與民聯合併，民聯 1991 年五大亦決議與民陣合併；1993 年 1 月民聯與民陣齊集美國華盛頓會議，計畫合併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擁護王若望出任主席，會前王若望曾巡訪各國民運組織，並在台灣獲得李登輝總統和行政院長郝柏村接見，提供民聯陣資助；民運華盛頓會議因會務程序爭議，王若望亦不滿徐邦泰失約參選主席，宣布退選，胡平、萬潤南、馬大維、錢達等也尾隨其後退出會議，結果由徐邦泰當選主席，楊建利、張伯笠當選副主席（喻智官，2011：241-55；翁衍慶，2016：210-12）。

¹ 30 年後成為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顧問。

不認同會議程序與結果的民陣與民聯成員隨之拒絕加入民聯陣，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於 5 月假洛杉磯召開全球中國人權和民運團體聯席會議，確認不承認華盛頓會議結果，成立了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和中國民主黨籌委會，王若望獲推舉為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總召集人，項小吉為秘書長（嚴家祺，2021：409；秦晉，2021：32）。8 月中，自民黨於美國康乃狄克州三福（Sanford）召開三大，選出王策擔任主席；1995 年 5 月，自民黨主席王策赴舊金山出席民聯陣二大，與民聯陣主席徐邦泰發表聯合聲明，同意於 1997 年 11 月，合併為中國民聯陣自民黨（鄭源，2017；翁衍慶，2016：217）。民陣和民聯則分別於 11 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與雪梨召開代表大會選出新一屆領導繼續運作，民陣繼續由萬潤南領導，民聯則選出吳方城為主席，民運組織乃形成三分或五分天下之勢（秦晉，2021：32-33）。民聯陣徐邦泰等與民聯于大海等就《中國之春》雜誌的歸屬在訴訟後達成和解，由民聯陣取得經營權，民聯則另外創辦《北京之春》雜誌（翁衍慶，2016：212-14）。

對於未來民主中國的設計，嚴家祺於 1992 年出版了《聯邦中國構想》一書，做了全面探討。他主張在保持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各個地區獨特性的基礎上，透過和平協商的方式建立一個聯邦制的憲政中國。而這一聯邦制其實是一種雙軌並行的聯邦制，香港、澳門、台灣是聯邦中國的三個鬆散成員邦，地位類似邦聯的成員國，而中國大陸地區則可選擇在既有省市區級行政區的基礎上成立 30 個成員邦。嚴家祺較之王炳章，而更提出了和平協商的具體制憲方法（曾建元，2009a：160-61）。嚴家祺進而在 1993 年 1 月民運大分裂後，積極籌畫關於未來中國憲法的研討會，而得到前台大心理學系副教授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劉凱申的支持。7 月 9 日至 11 日《中國統一模式和憲法結構》學術討論會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召開，與會者除嚴家祺，有民聯陣徐邦泰、楊建利，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吳元黎、會長劉凱申、《中國憲政》研究通訊主編張偉國、學者趙穗生、吳國光、郭頤穎、黃默，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與張鑫，以及台大政治學系教授胡佛、朱雲漢、明居正等等，會中針對未來中國憲法達成 3 項基本觀點：有現實基礎的理想憲法、有邦聯特徵的聯邦制憲法、有總統制特徵的

內閣制憲法（嚴家祺，2021：411-14）。

1993 年 10 月，中國人權觀察秦永敏在北京領導推動《自由憲章》，呼籲兩岸政府立刻開始直接的對等談判，相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足以使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也呼籲兩岸開放政黨跨越海峽發展，最終完成兩岸社會政治整合，也呼籲民進黨放棄台獨主張，積極致力於包括大陸、台灣、港澳在內的全中國民主進步事業；秦永敏也呼籲平反六四和釋放政治犯，被控擾亂社會治安判處勞動教養兩年（翁衍慶，2016：264-66）。

1994 年 1 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夏威夷憲政會議的成果，呈現在由嚴家祺主持，而以翁松燃、張鑫、劉凱申、嚴家祺、張偉國為成員的小組起草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當中以自治邦的地位賦予了內蒙古、台灣、西藏、新疆、寧夏和廣西，自治邦有非軍事性協定的外交權，而只有台灣可擁有軍隊；嚴家祺等主張兩層次的制憲談判，第一是由海峽兩岸之間政府對政府談判和平統一模式的擬定；第二層次則由北京政府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代表之間的協商，由這兩層次的談判確立聯邦制架構，成立制憲籌備委員會，草擬多種模式的憲法草案，確定制憲會議議員產生辦法，選舉制憲會議議員，召集制憲會議批准制憲（曾建元，2009a：161）。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而後又於 1994 和 1995 兩年在舊金山舉辦了兩次憲政學術研討會，呂亞力、胡佛、高朗、朱雲漢、魏鏞、邵玉銘等台灣學者曾專程赴美與會（嚴家祺，2021：430-31）。

三、神秘到透明：台灣政府與海外中國民運

1994 年 7 月，台灣完成第三次修憲，確定 1996 年第九任總統選舉改採公民直選，1995 年 6 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7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海峽舉行導彈演習，對台灣恫嚇示威，8 月，國民黨提名李登輝、連戰參選總統，1996 年 3 月，兩人連袂在解放軍導彈演習中當選中華民國首屆民選正、副總統，大選期間，美國派遣航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警戒。台灣完成所有公職人員本土選舉換血，中華民國完成本土化改造，從國民主權實現的角度，中華民國已成為台灣人的國家。前台灣革命黨總書記洪哲勝（1996）即提出台灣新思維，認為以獨立

運動形式從事的民主運動，已經初步解決了外來政權統治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問題，今後台灣人應該以民主決策取代統獨之爭，共同面對中共的侵略。5月10日，民進黨文化宣傳部主任周奕成起草，由民進黨新世代共同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主張台灣現狀就是台灣獨立，李登輝則在總統就職演講中宣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

台海危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極力修復關係，也許受到台灣民主化的壓力，有意改善國家形象，而決定分別在1997年和1998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和『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但也僅簽署而未送交人大批准。儘管如此，便足以吸引民運前來叩門、測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底線，在1998年掀起組黨運動的熱潮。1997年11月，魏京生經美國政府交涉，保外就醫流亡美國。1998年1月，王炳章潛回中國大陸，於2月宣稱成功組建中國民主正義黨，主張三民主義，旋遭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出境。4月，六四學生領袖王丹獲得保外就醫，流亡美國。6月，自由中國運動組織在美國成立，該組織為中國國內各地民運組織的聯絡平台，執行主任為八九學運時外地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6月25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問抵華當日，有王有才、王東海、林輝三人在浙江省杭州市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並向浙江省民政廳申請註冊，其後湖北有秦永敏、北京有徐文立等跟進。10月，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王策自西班牙偷渡回國，欲以《三十年不變民主改革方案》上書中共，不幸在杭州被捕（翁衍慶，2016：229-31）。11月6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在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宣告成立，推舉魏京生擔任主席。11月9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成立，主張推動第三共和，徐文立被推舉為主席，30日被捕。中國民主黨全面遭到鎮壓（翁衍慶，2016：217-20）。

就在1998年7月，民進黨顧問洪哲勝在巴西台灣僑領張勝凱的資助下，在紐約設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擔任會長、主編《民主通訊》、創立文摘網站《民主論壇》，並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專欄，倡議和支持中國民主化。民主亞洲基金會以稿費方式資助在中國大陸因政治迫害受到社會隔

離而不易找到固定工作的民運工作者或作家，其中筆耕最勤的，當屬劉曉波。1998 年 12 月 21 日到 1999 年 1 月 3 日，魏京生在萬潤南、盛雪（臧錫紅）和齊墨（修海濤）的陪同下，由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饒穎奇安排訪問台灣，獲得李登輝總統接見，與朝野各界廣泛交流。魏京生行前表明，贊同李登輝在 11 月為馬英九登台助選台北市長時提出的「新台灣人」概念，新台灣人指的是台灣外省人，經過半世紀的融合也成為台灣人，魏京生進而表明，支持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魏京生在台灣期間，提出中國民運作為中國第三政治，應與台灣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共同推動中國民主化與保衛台灣民主，離台前夕與台北市長陳水扁會面，陳水扁表示，有意推動重新解釋民進黨黨綱，台灣民主化後，民進黨的最大敵人不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晉硯，1999）。

1999 年 5 月民進黨召開第 8 屆全代會第 2 次全體會議，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凍結『台獨黨綱』，認為台灣已是民主的國家、國號依現行憲法為「中華民國」，改變台灣主權獨立現狀應經公投。這代表民進黨不再以推動建國為政治目標，中華民國在台灣現狀是民進黨關於台灣主權和憲政民主立場的底線。民進黨自此由台獨黨轉變為所謂華獨黨，即施明德在美麗島大審證詞中所公開主張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在 7 月 9 日，李登輝於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宣示兩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斷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會談作為報復。7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締法輪功。

2000 年 3 月，民進黨的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第 10 任正、副總統，政權和平轉移，台灣民主進入鞏固階段。在總統就職演說〈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昇的新時代〉中，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政治承諾：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保證在任期之內，就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議題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李登輝曾向陳水扁傳授治國心法，稱做為中華民國總統，有兩根柱子，不要動它，一是『中華民國憲法』，一是『國家統一綱領』。只要兩根柱子撐著，在裏面就可鑽來鑽去（自由活動）。陳水扁

(2019：237) 表示，自己是參考了李登輝的經驗，而有了以上的宣示。

民進黨一旦執政，就必須面對與中國民運的關係。關於台灣政府與中國民運的關係，李登輝不像蔣經國對民運和統一中國充滿熱情，甚至「希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台灣與民運的關係乃由「家人」的關係質變為情報交換的關係，而使中國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匯集站」，使民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王炳章，2002）。李登輝固然繼承了蔣經國以國防部軍情局主導處理與民運關係的作法，但則任由軍情局以機關本位的情報觀點來對待民運，如薛偉便稱，《北京之春》每年須提供軍情局 250 件情報做為對價（富權，2010）。到了陳水扁時代，民進黨對軍情局的運作更不熟悉也不放心，而軍情局的做法也的確對民運的政治聲望傷害很大，因而在執政之後即中斷了軍情局的既有機制，不料引起民運組織的大地震，暴露出中國海外民運組織在海外中國大陸移民和僑民界無力尋求並獲得普遍支持的窘境。2001 年 8 月，陳水扁總統任命台灣本省將領蔡朝明出任國家安全局長，外交部長田弘茂與次長高英茂本皆長期在美國任教，乃引進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援外模式，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進入了重新磨合的階段。

肆、台灣本土民間社會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以自決權重建價值共識的努力

台灣本土民間社會出於對於國民黨政府以一個中國架構實施白色恐怖的反感，以及中華民國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長期影響，對於中國乃產生出相當複雜的印象和感情，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或中華民國的中國，只要主張一個中國，都會對台灣主權的獨立地位產生威脅，而國民黨的傳統支持者和中國民運基於中華民族主義和自居中國正統立場，也都對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主權獨立主張存在疑慮甚至敵意。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1 條皆規定：「一、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

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二、所有民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但不得妨害因基於互惠原則之國際經濟合作及因國際法而生之任何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民族之生計，不容剝奪。三、本公約締約國，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家在內，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人民／民族自決權是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重要主張，因為當中包含民主多數決和民族自決的雙重意義，而以台灣人民集體為權利的主體。自決權的概念直接挑戰中國的大一統架構，意味著中國統治下的每一個民族或省區都有權自中國分離出去，所以贊同自決權與否，正好是檢驗表意者在分離主義的問題上是否仍服膺普世價值的測試劑。

對台灣本土民主勢力而言，是否接受台灣人自決獨立，是檢驗中國民運的普世價值立場最直接的方式，但這不代表中國民運要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在這一問題上，論者必須能夠清楚區別應然與實然，或者是當為與存在的不同，換言之，政治或經濟的現實利害考慮，和價值上的判斷選擇是兩回事，台灣本土社會的普世價值立場是從事政治或社會運動工作必須信守堅持的價值底線，同樣也基於價值相對主義，對於任何人的政治或民族認同，都必須基於維護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的立場給予尊重和保護。但現實政治利害計算則是另一個範疇的事，對於生命權和財產權的保護，也是人們締結社會契約建立國家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目的。

前已言之，台灣人受過殖民統治，他們的近代國家經驗中，大日本帝國是異族暴力壓迫台灣人的國家暴力機器；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在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前，也帶有中國黨國殖民的暴力性質；現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更是充斥大漢族主義色彩的黨國殖民體制，因此現實中的國家並不是甚麼神聖的營造物，但中國傳統文化卻把國家視為倫理的共同體，由於一般人的思維在應然與實然的界限上混沌不清，這也就使得統治者有了以道德形象包裝暴力以及以暴力維護道德形象的操作空間，而得以進一步形塑愚忠的順民和暴民。

1991 年 5 月，中華民國第 1 屆國民大會在台灣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制定『憲法增修條文』，自行表述國家為統一前狀態，默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在國家的中國性之中，自限憲法秩序在台灣自由地區，這就已經為走出政治上的一個中國打開了空間，也使中華民國的台灣性在憲法中得到證成和成長的養分。進言之，當『憲法增修條文』出現了這樣的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就表示在普世價值之下，屬於中華民國公民所專屬的基本權利和國民義務，已只限台灣人民為權利義務主體，中國大陸人民不再當然可以主張；而當第 2 屆國大代表和立法院立法委員全部在台灣選出，政黨比例代表中設置全國不分區席次而不單獨設立大陸代表，在政治實踐中，也從無中國大陸人士被國民黨和各政黨納入候選名單，這說明了中華民國的民主化無可避免地帶動了本土化，台灣人會越來越只會關心生活世界裡的大小事。

二、六四鎮壓與台灣本土化拉開兩岸距離

1989 年的四一五學潮，最後以六四屠城告終。當年的 6 月 3 日晚上 9 點，唐山樂集發起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同時在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廣場和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由孫越、虞戡平、薛雲峰以及台灣音樂人侯德健在兩地現場主持。唐山樂集為了避免兩岸和台灣內部民族認同的衝突，還要求台北與會者不得攜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各政黨黨旗。中國人民解放軍竟在夜間 11 點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命令，在全世界和台灣人民眾目睽睽下，兵分 7 路向北京城進攻。此刻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聽到北京大學生的連線電話，是槍聲中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馬少方稱「年輕只有一次」，告知要回到天安門廣場與同學共存亡，最後一通電話則是子夜裡唐山樂集負責人陳百忠沙啞的聲音：「現在解放軍開槍了……」。變調的兩岸晚會在解放軍的殺戮中進行到次日清晨 6 時天安門廣場清場才解散，歷經一夜驚恐，台北廣場上的群眾悲傷地共同吟唱著〈龍的傳人〉和〈歷史的傷口〉，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在台北廣場上宣告成立（曾建元，2019）。

六四屠城之後，台灣各界發起譴責與救援活動，6 月 4 日當天正值國民黨第 13 屆 2 中全會，場內如馬英九、趙少康、林火旺等黨代表，皆公開聲

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時任黨主席李登輝發言指出：「中國的民主化是全民所熱烈期盼的，革命的目的就在使中國人民能夠自由、正直且有尊嚴地立於天地。」中華民國政府也隨即於 6 月 15 日由行政院頒布『支援大陸民主運動措施』，以政府的力量提供實質性的援救措施。然而少有人知道的是，國民黨海工會同樣也展開如同香港「黃雀行動」的代號為「黃鳥計畫」救援行動，而組織營救團隊化身旅行團進入中國大陸各地，再輾轉透過偷渡的方式，從福建營救出約 400 名異議人士。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馬英九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計畫，但曾捐出美金 1 萬元，而像台灣水泥集團董事長辜振甫等，亦都曾出資援助該計畫（國民黨青年團，2021a）。政府從香港接進逃出中國大陸而投奔台灣的民運人士和學生，其中較著名的有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應屆畢業學生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物資處處長顏柯夫（黃瑞珍，2019）²。血援會自此每年都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下舉行悼念晚會，馬英九是唯一每年出現在中正紀念堂六四紀念活動的政府官員。

1990 年 8 月，全球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成立，選舉全美學聯主席劉永川和台灣大學生聯合會台大學生會長林奕華出任首屆正、副總召集人，1991 年，全球中國學聯的台灣志願者成立中國青年團結會，發起人有台大哲學系杜保瑞、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張國聖、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姚蘊慧等研究生，當年暑假 7 月 20 日至 8 月 5 日舉辦首屆全球中國學聯《台灣之旅》研習營，邀請各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學者訪台。中國青年團結會創辦的宗旨，就是希望增進兩岸青年的交流和對於彼此社會發展的認識，而以中國大陸留學生為主要交流對象，除了早期中國大陸內地學生來台簽證不便外，主要還是認為留學生在海外受到進步理念和民主經驗洗禮，回國後更能引導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革。中國青年團結會早期入會的會員較具有中國認同傾向，但基於對於民主自由的信念，在參訪活動的安排上，務求做到統獨與朝野平衡，以使中國大陸留學生對台灣有全面的認識（姚蘊慧，2012）。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幹部群定期換屆換血的團結會，

² 民進黨也有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抗議靜坐和設攤徵集抗議簽名。

對中國統一的立場傾向也就越來越保留。

三、反對運動，惺惺相惜

2000 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執政，民進黨人陳水扁、呂秀蓮連袂當選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台灣反對運動透過寧靜革命民主選舉而能贏得政權，對中國民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陳水扁（2019：261-62）於就職演說〈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昇的新時代〉中提出了關於兩岸關係的「四不一沒有」政策，承諾「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議題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四不一沒有政策的前提條件是「中共無意對台動武」，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諾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四不一沒有是隨時可能被廢棄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視兩岸分治現狀為台灣事實主權獨立，改變現狀必須通過公民投票，因而在法理上，現狀並非台灣獨立，而是處在「國家統一前」狀態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從台獨的實踐論來看，如果中國不民主化，中國大陸人民不懂得接受民主自決的價值和可能結果，中國大陸會永遠是台獨的障礙，兩岸關係永無寧日。所以台灣支持中國民主化，有基於普世價值的信念，但也有追求國家正常化的策略計算。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立場固然有所不同，對於台灣前途有不同的想像和期待，但至少信守普世價值，是不應當有所區別的。

2001 年，陳水扁政府國防部軍情局長薛石民停止對《北京之春》和《民主論壇》等中國民運刊物的資助，引起中國民運界的大震動。然薛石民的動機很單純，只是出於檢討既有機制的考慮，因他認為民運需索無度，所以並不是要中斷支持（呂昭隆，2022）。薛石民之舉一度讓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背了黑鍋，民運圈以為中斷資助與統獨意識形態有關，卻也讓黑箱作業下的民運資助機制爭議和績效有了機會受到檢討。

儘管如此，陳水扁政府仍針對資助王丹和中國戰略研究所所長王軍濤設計了「二王專案」。該專案據稱最早係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顏萬進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奉命與王

丹、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基金會（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訪問學者陳小平、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吳稼祥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寧、四川師範學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張祖樺、香港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盧四清在美國波士頓會商後確定的，而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由王丹出任主席，王軍濤出任理事長。王丹再加入《北京之春》雜誌董事會，並出任社長（王綽中，2006）。劉軍寧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的中譯者，2001 年 7 月，張祖樺出版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其憲政思想乃深受亨廷頓的影響，而其所推崇的中國民主化途徑，則是他所稱的「台灣模式」，即由黨國由上而下推動而與反對黨合作實現的憲政轉型（張祖樺，2018）。

2002 年 4 月，楊建利持假護照在中國大陸內部活動而被捕；6 月，王炳章回國發展組織工作和發動起義的意圖洩漏，在越南廣寧省芒街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局綁架回國（翁衍慶，2016：232、242）。這在在都顯示，中國民運有意在 2001 年 1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改變既有的格局以及與台灣的合作模式，特別是一向主張民運獨立的王炳章，更欲以更具開創性的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從事組織與動員，也以此來證明自身的價值。9 月 30 日，民運作家曹長青（2002）在網路發表〈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一文，嚴詞批判《北京之春》雜誌兼及王軍濤等，認為台灣資金應該資助專案，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而不是繼續單線秘密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幹，而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機制，他主張台灣政府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來處理民運經費問題。

薛石民攪亂民運一池春水驚動了洪哲勝，後者於 9 月底專程回國瞭解並遊說民進黨和台灣本土社團支持中國民運；洪哲勝行前與台灣各界聯繫，包括投稿《民主論壇》而在網上認識的台灣智庫法政部副主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曾建元。曾建元與民主亞洲基金會及中國民運的淵源是《民主論壇》的經常性投稿者，由此得到洪哲勝和民運圈的信任。洪哲勝回國獲得陳水扁、呂秀蓮和外交部長簡又新的接見，其理念乃皆得到明確支持（曾建元，2003：407-408）。

而就在洪哲勝離台不久，10月14日中午，吉林省中國民主黨人唐元雋由福建省廈門市偷渡金門縣烈嶼鄉大膽島（鄭大行，2002）。他出發前聯繫了洪哲勝，曾建元在當日便將唐元雋投奔自由的消息通知《台灣日報》記者林朝億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林峰正也趕到金門關心。唐元雋因泅泳力竭為退潮捲入海中，全身被海底的礁岩和貝殼嚴重刮傷，獲救時全身鮮血淋漓、奄奄一息。他的非法入境因政治犯身分受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之後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在新竹靖廬，民主亞洲基金會委任曾建元為台灣代表曾前往探視。唐元雋最終得到美國政治庇護，一度在《民主論壇》擔任編輯。

洪哲勝因與中國民運長期互動，對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下與中國民運的未來關係深表關切，因而積極向國內力爭重建合作機制。2003年3月委由曾建元規劃了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由董事黃再添領隊，邀請中國與國際民運領袖訪問台灣，與台灣各界進行對話交流，並了解民進黨政府的政策方向。受邀者以《北京之春》主編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為首，成員有流亡瑞典作家莫莉花（茉莉）、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林保華、楊月清夫婦、中國和平組織主席唐柏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西藏通訊》主編跋熱·達瓦才仁和馬來西亞人民公正黨律師謝嘉平。民主亞洲基金會與東吳大學於3月24日合辦《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際圓桌討論會，之後安排來賓參訪台灣各地（曾建元，2003：475-501）。

2003年6月，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財團法人由外交部編列預算營運，董事依立法院政黨席次比例由各黨推派，董事長則由立法院長擔任，工作宗旨為支持全球民主事業。筆者以為，台灣的對外民主支持，本就應以中國民運為重心，因為中國問題才攸關台灣的國家安全；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設置，對全球民主的關注，從而將中國民主放在全球民主架構下思考，乃是欲以人權普遍化和人道主義的新典範重新定位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曾建元，2013）。這無異稀釋了中國民運在台灣反共戰略中的份量，對國際民主事業的支持，必然弱化了對中國民運的資助，但這也顯示，台灣在全球民主大戰略上，選擇成為美國最可靠的合作夥伴，美國則以對台灣的安全保證，輻射出對於中國民運和中國民間社會的重視和資助。

2004 年 4 月，薛石民升任國安局長，以台灣民主基金會已成立為由，進一步緊縮對中國民運的資助（呂昭隆，2022）。5 月 26 日，《中國時報》報導「二王專案」，引起輿論譁然（王丹，2012：392-93）。惟陳水扁長年從事反對運動，對中國民運有著出自同理心的惺惺相惜，除了聘請流亡美國後來台的前胡耀邦幕僚（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客座教授）阮銘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更運用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在資助民運的新機制之外，對民運中的少數領袖人物或明星提供個別的援助。11 月，陳水扁總統由國務機要費中撥款 10 萬美元資助王丹。王丹係透過總統府辦公室主任馬永成洽得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志芳晉見陳水扁，王丹表達原接受軍情局補助，後來中斷，請求總統陳水扁支援；第二次是 2006 年 2 月間，指示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和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主任郭臨伍執行資助王丹³。

2006 年 5 月，民陣聯合人權無疆界、台灣民主基金會和柏林歐洲研究會，在德國柏林召開了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並成立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國策顧問金恆煒發表引言報告〈民主——兩岸人民的共同燈塔〉，內容涉及台灣獨立問題，金恆煒露骨地表達道，「中國民運如要台灣支持，應當對我們台灣人民獨立的訴求，有一個明確的支持表態……」，這一發言，當下引起軒然大波（陳泱潮，2006）。如果真如金恆煒所稱民主是兩岸人民共同燈塔，則他應當尋求中國民運支持的，是尊重台灣人民民主自決的結果，而不是台灣前途眾多選項中的特定一個。柏林會議民陣爆發內鬨，澳洲民陣分部主席秦晉（郁文龍）宣布獨立為澳洲民陣，2008 年荷蘭分部王國興等不接受民陣改選新任主席費良勇，率澳洲等八國民陣分部另立中央（秦晉，2021：123-26）。

2006 年 12 月 26 日，曾建元由中國大陸流亡詩人黃貝嶺推薦，到澳洲墨爾本出席由澳洲國際學人基金會舉辦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並且在「中國的苦難」群英演講會上發表演說。與會者的共通特色，都是

³ 馬永成由總統府辦公室主任林德訓保管之國務機要費中領取新台幣 330 萬元現金，請託秘書陳心怡換成 10 萬美元，再由郭臨伍請託民進黨新潮流系前總幹事歐洲聯盟研究協會顧問張維嘉透過其友人輾轉交給王丹（顏振凱，2022）。

在海外民運界於文化、思想有一定成就的人士，多為獨立的文化工作者及網路作家。曾建元的演說談到六四天安門學運與台灣野百合學運的關係，野百合學運開啓了台灣民主轉型和修憲的契機，台灣的民主化有其爭取國際支持及兩岸競爭的因素，而六四學運有絕對的影響；台灣要走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道路，這意味著兩岸關係將發展出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思維和法制架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協調委員會首席委員前北大法律系講師、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袁紅冰在年會上鄭重宣告該運動與台獨和中共無關，曾建元（2007）當即發言提醒，台獨是台灣人民對自己國家前途的一個選擇，應當受到真正的民主運動者的尊重；不論是否支持台獨，每一位中華民族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責任與義務去捍衛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共產專制與自決獨立是反民主和民主的對比，在普世價值的範疇裡，乃不可相提並論。

2008年4月10至13日，澳洲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與國際學者基金會在曾建元幕後協助下，於台北徐州路台大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與政大綜合院館北棟一層會議廳共同召開「中國苦難文學暨戒嚴與後戒嚴時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同時在會前舉行2007年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台大經濟學系張清溪教授因有關中國經濟的研究而獲頒第一屆經濟學獎（趙晶來，2008；紅線，2021）。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也利用首席委員袁紅冰訪台機會，舉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系列叢書的新書發表會，宣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已在台灣建立經營的據點。同時擔任台灣北社法政組召集人的曾建元，更利用袁紅冰訪台時機為其在台灣北社舉辦「背對中國、面對中國，一個反共中國人給台灣新總統的諍言」演講會，聽眾擠爆，引起轟動。袁紅冰乘勢在次年11月出版《台灣大劫難——2012不戰而勝》、舉行巡迴座談，與台灣本土社會對話、深入認識台灣；2010年他受聘為開南大學法律學系講座教授，公開主張台灣人民應通過台灣共和國的建國運動鍛鍊出台灣人民捍衛自由的大國魂。袁紅冰對台灣人和中國人親自演示了標榜對中國自由文化的追求，並不妨害在政治上認同台灣獨立建國。這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價值選擇，超越了民族主義。

四、國共合作，民運冷落

民進黨初次執政，本土化的路線導致統獨與民族認同的衝突驟然升高，連帶使兩岸關係緊張不已。國民黨乃思與共產黨展開對話與交往，以此向台灣內外證明自身有能力管理兩岸關係風險，藉以尋求贏回政權。國民黨原本規劃於 2004 年第 11 任總統大選勝選後，由連戰以總統當選人身分在就職前訪問中國大陸，但這構想因敗選而未能實現（Wang, 2011: 180）。國共關係的變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寬了對於國民黨和民國史論述觀點的控制，於是民國熱現象開始升溫。2004 年 8 月，有民國派網路社團中國泛藍聯盟在武漢青年文炎（孫不二）與流亡台灣的江蘇省中國民主黨人陳榮利等為首發起成立，推舉文炎為主席，盟員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對於利用國共第 3 次合作推動中國民主化有著天真的期待。

2005 年 4 月 29 日，國民黨主席連戰與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談，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共識，確認以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作為國共兩黨政治共識；儘管如此，九二共識和台獨的內涵為何，國共雙方認知卻有所不同。事實上，1992 年兩岸政府接觸之初，兩岸間係以口頭各自表述的方式，就事務性商談達成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但其涵義認知各有不同的諒解，我國堅持保留對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權利，而對岸則拒絕在事務性商談中表述一中的內涵，而所謂的九二共識，則將原先的事務性商談擴張到政治性談判（曾建元，2016）。連戰更在此行中於北京大學宣示，要與共產黨聯手制台獨（王寓中，2005）。但究竟台獨定義為何，卻人言各殊。以李登輝所提的特殊兩國論而言，陳水扁（2019：110-11）便不認為是台獨，因為當中強調兩岸的特殊性，因此屬於一中各表、是一個中國的論述。蓋對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曾於 1999 年 7 月 20 日提出質疑和警告，如果台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名義實現「台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李氣虹，2020）。由此可知，對岸在意的是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對其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地位的挑戰，而不是簡單的台灣人是否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的問題。

2006 年 2 月 20 日，中國泛藍聯盟陳榮利向國民黨提出入黨申請，國民

黨答以依『人民團體法』規定，中華民國政黨黨員須具備國籍而予以婉拒（楊孟瑜，2006）。6月，中國泛藍聯盟宣布有102名國民黨精神黨員參選人大代表，其後盟員陸續遭到約談和打壓（陳奎德，2006），主席文炎甚至於2007年5月遭到逮捕，2011年6月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懲有期徒刑6年，關到2013年出獄（維靈，2013）。2009年中國泛藍聯盟發表聲明，抨擊國民黨對他們的遭遇不聞不問，而民進黨對他們尚有一些公道話（中國泛藍聯盟，2009）。2014年10月10日《環球時報》社評〈病態的「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一文刊出，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於民國熱的態度，民國熱終於告一段落（許劍虹，2021）。國民黨對於中國泛藍聯盟精神黨員的受難未曾在國共間年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有所反映，也從未公開聲援過，國民黨怎麼看到中國民運，乃不言而喻，避之唯恐不及，深怕「中國不高興」。

2008年3月，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擊敗民進黨的謝長廷，馬英九答覆媒體詢問是否邀請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訪台，答以時機不宜，引起譁然（邱燕玲等，2009）。馬英九於5月出任總統，台灣二度政黨輪替執政。2008年11月，對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應邀訪台，馬英九政府有意營造國共合作下兩岸關係的良好氣氛，由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也有意藉抗議陳雲林來訪整頓隊伍。政府限制國旗舉掛以避免陳雲林在場尷尬，更有警察取締群眾持國旗，加以陳雲林於台北賓館晉見馬英九總統時不願承認其總統地位，遂給民進黨和抗議群眾找到國民黨政府自甘國格矮化的把柄，群眾與警察爆發嚴重衝突（劉志聰，2008）。

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週年，由劉曉波領銜發起、張祖樺主稿的《零八憲章》草稿公布並徵求連署，這是一個基於憲政主義的修憲主張，實際上卻是否定黨國體制的，為此《零八憲章》甚至提出了轉型正義的主張。而關於兩岸關係，《零八憲章》則主張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兩岸通過對等談判和互動合作來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曾建元，2019a：163）。曾建元是《零八憲章》的第一批台灣連署者，最初《零八憲章》在台灣徵求連署，確實讓許多台灣人躊躇不前。由美國移民來台的林保華，即批判《零八憲章》迴避了民族自決的問題不談（林保華，2008）。而更多

人是從連署者的立場來提出異議，究竟是擁護普世價值的台灣人，還是簽了以後就成了「中國台灣人」？《零八憲章》是群體智慧的結晶，劉曉波支持住民自決，甚至制定新憲，但在《零八憲章》他只能贊同聯邦制和修改憲法（余杰，2017：338）。儘管如此地自我約束，《零八憲章》公布之後，劉曉波即受到軟禁。

2009 年 4 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公布施行，兩公約在台灣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這一立法緊隨於《零八憲章》之後，不僅全面提升了台灣政府與人民的人權視野，事實上也更加大拉開了兩岸的人權發展差距，而與國民黨政府面對六四和中國人權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反差，此際，甫於前一年（2008 年 6 月 5 日）通過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口試的王丹，應邀來台客座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王丹，2012：395）。2009 年六四 20 週年，馬英九總統以先前四川省發生汶川大地震為由，低調地在網上發短文紀念，還鼓勵性地肯定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進步，期待能繼續往民主自由大道邁進；他次年繼續低調，以行程太忙為由缺席中正紀念堂的六四紀念活動，還發文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4 月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原本總統府通知王丹，擬於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週年當天或隔天接見王丹，但此一安排臨時取消。吾爾開希公開表示，對龐建國稱因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而不便出席六四 20 週年紀念會而感到不解（邱燕玲等，2009；王丹，2012：360-61）。

在六四 20 週年紀念活動當天，龐建國仍出現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與會者還有薛偉、汪岷、前民進黨籍立委林濁水、作家司馬中原（吳延玫）、歌手殷正洋等。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姚立明感慨說，馬英九過去 18 年都有來，但當上總統後就沒來了；他希望馬利用和中共談判的機會，呼籲中共釋放六四人權鬥士。畫家顏柯夫為六四時北京清大學生、由香港「黃雀行動」救出庇護，他以半個台灣人的身分呼籲馬總統，「不論你要跟什麼人當好朋友，夜深人靜，是否想想對人的基本價值觀是什麼？」2009 年台北六四紀念舉辦過後，馬英九決心改組了台灣民主基金會，由黃德福接替林文程出任執行長，以配合兩岸休兵的政治氣候（陳民峰，2009）。

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兩會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在國共和解的氣候下，血援會舉辦六四紀念會，統派進退失據與意興闌珊，讓台灣本土社團找到重新定義六四的歷史機遇。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提議和在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客座的王丹的支持下，台大歷史學系香港籍學生黃俊傑等參與過中國沙龍的大學生另起爐灶，於 2010 年在台大校園舉辦六四 21 週年紀念活動（Chen, 2019: 139）。

2010 年 10 月 8 日，諾貝爾基金會宣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2 月 20 日，民進黨籍前立委羅文嘉與王丹，選擇在第六次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會談召開的當天聯手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將自次年 6 月起推動每年一次的「兩岸民間社會對話平台」，每月一次的中國沙龍、自 2011 年 3 月起發行《公共知識分子》季刊，並將在台北與美國紐約兩地各設一個辦公室（王丹，2012：397-99）。

在此同時，1989 年時任香港嶺南學院學生會長兼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的香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陶君行來台與王丹商議成立中港台三方平台，王丹向陶君行建議曾建元為共同發起人，最後由陶君行邀請得香港民主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兼香港公民黨秘書長鄭宇碩、王丹請出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與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曾建元洽請台灣智庫董事長民進黨籍立委林佳龍、和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忠華共 9 人組成董事會，依林佳龍建議命名為華人民主書院，於 2011 年在香港註冊成立有限公司，台北與紐約設有辦事處，而由王丹擔任董事會主席，聘王興中為秘書長、鄭宇碩為校長。華人民主書院於 2011 年 5 月 30 日在台北市宣布成立，是希望通過網上教育和實體交流向全球華人社會推廣民主和培養人才（張達明，2018）。因為華民的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的階段性任務完成。而在稍早的 5 月 14 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成立，曾建元受邀與阮銘等為發起人，選出中央廣播電台常務董事兼「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節目主持人楊憲宏為理事長，配合央廣節目所挖掘到的中國大陸人權議題或個案表達關懷和倡議救援。

2011 年六四活動，乃由王丹以巡迴校園的中國沙龍串連出來的香港留

台以及台灣本地學生組成的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聯合工作小組，取代了血援會，撐起了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曾建元、楊雨亭，2019），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的主要成員有黃俊傑、金昱、林家興、涂京威、吳君薇、周慶昌等台大或清大學生，幕後還有中國大陸留台學生。經過群眾換血的六四 22 週年台灣悼念晚會，約有 400 人參加，背後有台權會協助串連的各個人權團體設攤共同參與，與前一年的冷清場面形成強烈的對比。六四晚會因涉及籌辦經費非學生可負擔，而後改由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接過主辦兩屆，再交由華民主辦，並號召與華民有夥伴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共同協辦（曾建元，2019）。2011 年以後，台北六四紀念活動因台港學生自發性舉辦逐漸走向本土化，論述也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轉變昇華到普世價值和人權的捍衛（國民黨青年團，2021）。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世界人權日前夕，在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推動和游說下，立法院無異議通過了 22 位民進黨籍立委關注及救援中國良心犯提案，要求政府關注被關押的 4,033 名中國良心犯，以落實兩公約之實踐並順應國際潮流；案由指出，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規定，對於因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信念而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押在勞動教養所、監獄、拘留所及看守所之民主活動家、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及西藏人士等良心犯應予以關注，並應制定相關法令予以救援及協助。次年 11 月 12 日立法院再度無異議通過提案，要求政府落實『關注及救援中國良心犯決議案』，具體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釋放王炳章、高智晟等 16 名良心犯（鍾元，2013）。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台北紀念活動中，民進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了由華民安排來訪的流亡海外六四受難者，這是中華民國總統第一次在總統府以紀念六四名義正式接見與安慰六四受難者，而血援會則在六四當天舉辦《反對王丹》座談（曾建元、楊雨亭，2019）。統獨易位，場面令人錯愕，也不勝唏噓。華民則在六四 30 週年晚會上，特別請出了虞戡平上台，表彰他們當年聲援六四的義舉。

伍、中國民運走進台灣，台灣民主回饋中華

一、台灣觀選，見證民主

中國海外民運自王炳章於 1982 年紐約首義至今已歷 40 年，當年台灣尚非民主國家，動員戡亂體制宣示兩岸關係還處於中國的內戰狀態，蔣經國對於反攻大陸壯志未酬，把中國民運視為家人，依靠黨國威權體制對中國民運提供大量資助，到了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終止動員戡亂實施憲政，黨國體制走向黃昏，對民運的支持日益官僚化，待到陳水扁執政，本土政權上台，台灣民主鞏固，與中國民運關係全面重建，經費支援納入國家體制，接受監督，國民黨與共產黨 2005 年第 3 次合作，待到馬英九執政，民運隱然成為兩岸關係以及國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這也就將台灣與中國民運關係的重建，提上了歷史的進程。

中國民運具有中華民族主義的基因乃天經地義，但改造中國為民主國家，才是民運的天命。中國要作為中華民族主義的民主國家，就必然要擺脫表現為中央集權體制和大漢族主義的大一統中華帝國主義，如果服膺普世價值，就要接受人民／民族自決權在中國的適用，否則就是虛假的，而台灣和西藏議題就是對中國民運工作者價值信念最有效的檢驗。

訪問台灣，與台灣民間社會交往，體驗台灣的多元族群和選舉政治，是中國民運工作者認識和民主實踐最直接的方法，而中國民運在台灣的身說法，也是台灣社會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中國民運和台灣朝野的交流，對於提升彼此眼界視野有極大的幫助，在這種交往過程中所建立的革命感情，也必將是兩岸民間相互理解體諒、關係重建的起點。

早期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交流，無可諱言，政府部門中以軍情局為主導，民間機構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為前鋒，而由中國青年團結會承擔主要任務，其中以每年暑假邀請海外中國學人學生來訪的「台灣之旅」研習營最具代表性。1991 年 1 月陸委會成立、下設聯絡處，主要業務是聯絡與維繫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關係，對海內外的交流互訪提供經費

補助。陸委會為新成立的政府部門，不像軍情局留存著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遺緒和組織文化，對於民運發展的認識都還在開始階段，所以要等到民進黨 2000 年執政，軍情局退出主導台灣與民運關係的角色，陸委會聯絡處的功能才逐漸發揮，從而台灣本土社團才因為與民進黨政府的關係，有機會在兩岸關係和中國海外民運的領域中有更多貢獻。

由於台灣在 2008 年 7 月才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國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2011 年 6 月才進一步開放個人自由行，所以在此之前，中國大陸人民無論身在國內或國外，要到台灣，都只能循專業參訪申請專案批准許的程序，而由台灣法人出具邀請函和代辦申請，所以海外民運工作者有意來台訪問者，必須得到台灣政府的同意以及台灣非營利公益法人的邀請。1996 年 3 月中華民國第 9 任總統暨第 3 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前者首度以台灣公民直選方式為之，是華人世界首次總統民選，全球矚目，台灣政府廣邀並歡迎各國人士來台觀選並做見證，各洲中國海外民運團體與領袖也在邀請之列⁴。這次成功的民運觀選經驗，從此建立了台灣觀選安排的模式，即拜會涉陸政府機構、主要政黨、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候選人競選總部、與參觀競選活動如掃街、造勢晚會和投開票過程。

民運經費依賴募捐，資源珍貴，在世界各地舉辦活動或往返台灣觀選等，如果沒有經費的補助，便極難成行，台灣政府提供的預算，不論金額大小，總是多少有所幫助。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台灣政府調整了與民運的關係，更加注重政治中立和公開透明，加以公務人力有限，所以民運來台觀選或在台灣舉辦活動，台灣民主基金會或其他政府外圍組織以及各個

⁴ 此次應邀赴台的民運團體與人士，有中國民主黨海外主席王若望、民聯陣主席徐邦泰、自民黨主席王策、民聯主席吳方城、民陣主席萬潤南、全美學自聯主席邢崢，全加學聯主席朱甯生，《北京之春》主編于大海、經理薛偉、中國人權主席劉青、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以及劉賓雁、郭羅基、蘇紹智、阮銘、陸鏗、柴玲等，應邀參訪的民運人士先後走訪了國民黨李登輝連戰、民進黨彭明敏謝長廷、無黨籍林洋港郝柏村以及陳履安王清峰等四組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總部，觀察了競選活動和投票實況，同時參觀了立法院、中央選舉委員會、陸委會、法務部、海基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團結自強協會、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等民間和政府機構，進行了多場座談（芳呈，1996：102）。

台灣民間團體，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在地協力者。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之後，也自 2004 年 3 月當年在第十一任總統起自行主辦納入中國海外民運的國際觀選團，也對海內外民間團體舉辦的觀選活動提供補助。

二、民運重整，會師台北

為因應 2008 年 7 月我國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入境，特別是專業參訪的規劃和辦理，曾建元在與其同時擔任謝長廷競選總統幕僚前民進黨青年發展部主任林俊佑、周思萍夫婦支持下，於 2008 年 9 月發起成立台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曾建元當選理事長，並任命林俊佑為秘書長，常務理事中有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林啓驊。台發會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在 2009 年 3 月 28 至 29 日，與台灣文化基金會、台大國發所和政大國發所，共同承辦澳洲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於台大國發所召開的「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台灣經驗與中國苦難的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環繞著「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並舉辦了 2008 年第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的頒獎，台灣哲學家史作檉獲頒哲學獎。受邀來台的十五位中國大陸出席者，全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境來台（陳柏年，2009）。中國自由文化獎只頒到 2009 年第 3 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打壓，大陸得獎者難以出境領獎，故而不舉辦頒獎典禮和相關活動⁵。

2009 年 8 月 6 至 8 日，西藏流亡政府在瑞士日內瓦舉辦首屆「尋找共同點」漢藏會議，其中關於西藏民族的自決權問題經過激辯，最後未能成為〈尋找共同點——日內瓦藏漢國際會議共識〉的內容，當中或有爭取中國大陸漢人支持西藏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權的策略考慮（盛雪、陳奎德，2009）。台灣與會者⁶對西藏和中國大陸漢人關於自決的顧慮雖然理解，儘管對兩岸統獨的立場不一，但都肯定自決權是普世人權，台灣人和西藏人都應擁有自決權，而在會外與各方的交流中，也就形成了歡迎並樂

⁵ 第三屆文化成就獎由邱榮舉以從事台灣客家文化復振運動的成就獨得（曾建元，2012）。

⁶ 受邀與會的台灣人士有前新黨籍立委中國民主黨顧問錢達、曾建元、台灣團結聯盟政策暨文化宣傳部主任周美里等，與各洲中國民運和西藏自由運動領袖廣泛交換意見。

意促成中國民運和流亡西藏加強與台灣本土社會對話的共識。

當年年底 12 月 5 日，台灣各省轄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台發會即由錢達策畫，中國民主黨副秘書長孔識仁（李明）執行，主辦了台灣 2009 年地方選舉考察團，安排了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徐文立、秘書長汪岷、民聯陣主席黃奔、八國民陣副主席秦晉、香港前線主席甄燦港以及六四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陳達鈺等赴台觀選，除與國、民兩黨和台灣民主基金會交流，也親赴台灣西岸南北重要選區參觀競選活動，團員對台灣民主的生根發展乃深受感動和啟發（孔識仁，2009）。這是台發會成立後，第一次為海外中國民運舉辦的觀選活動。

民聯陣主席黃奔與前主席汪岷受到日內瓦漢藏會議成功的鼓舞，為華盛頓會議後分裂的中國民運整合積極奔走，促成民聯陣、民聯和八國民陣於 2010 年 4 月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宣布成立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而以八國民陣副主席秦晉為秘書長，前民陣監事會主席錢達為監察長，在決定於台北召開三民整合會議後，即委由莫逢傑（民聯主席）、王國興、黃奔、錢達、汪岷、秦晉、金小炎（民陣英國分部主席）、曾建元進行籌備，後再增加民聯總幹事秦新民，會議由台發會承辦，全球治理與區域發展學會協辦。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討」國際會議在台北天母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農訓中心召開，由錢達主持開幕式，秦晉致開幕辭，曾建元致歡迎辭⁷。這是中國民運首度在台灣的大規模集會，八國民陣在台北換屆改選，王國興續任主席，錢達出任監事會主席，監事中有台灣人輝戈（吳國正）新當選。三民等中國民運各重要團體齊集台北，

⁷ 台聯黨主席前陸委會主委黃昆輝、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跋熱·達瓦才仁（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中國民主黨聯總主席徐文立、前民陣副主席多萊特·吾爾開希受邀致詞，現場並播放澳洲綠黨籍參議員布朗（Robert James Brown）、公民力量召集人楊建利錄影致詞。其他中國民運領袖出席者有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王策、自民黨主席潘晴、社民黨秘書長劉因全、前民聯主席《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前民陣主席齊墨、杜智富、前自民黨代主席楊農、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王丹，及香港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紋、香港五七學社總幹事武宜三（凌文秀）等。海外來台與會者約 70 人，不包含遭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境的 10 人。

肯定台灣民主成就並對台灣表示支持，有其在兩岸關係史上的重大意義，惟國、民兩大黨皆對於中國民運冷處理，僅禮貌性地表態⁸。單從台灣與會者的名單來看，顯示在國共破冰交融之後的蜜月期間，國民黨人對於現身公開支持中國民運相對謹慎的態度，民進黨中央重視不足，但存在著基於反對運動經驗而來的同情與支持。大會會後發布了〈迎接中國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中國民運台北會議宣言〉，呼籲關注王炳章和劉曉波繫獄，也呼籲台灣朝野各黨和港澳民主力量的支持。三民組織則改組為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由王國興出任首任主席團召集人，秦晉為秘書長（秦晉，2010、2021：174-77；Yu, 2021: 143-44；慶正，2010）。

三民台北會議一經結束，接著在 11 月 27 日登場的是由台發會與中國民主黨聯總主辦的台灣 2010 年五都選舉海外華人學者與專家考察團，以及在 28 日由徐文立設立的美國關注中國中心和台灣的公督盟協辦舉行的「2012 年前後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戰略」研討會，地點同樣在台北天母農訓中心，主要的執行者為孔識仁。海外與會者以中國民主黨人為主，如聯總主席徐文立、秘書長汪岷、美東黨部主席唐元雋、德國黨部主席張思利、丹麥黨部主席藍煒、香港黨部主席萬寶等。2012 年 1 月台灣第 5 屆總統直選和第 8 屆立委選舉，台發會亦協助孔識仁規劃由台灣文化基金會舉辦的兩團觀選，海外團邀請有汪岷和錢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程幹遠等 14 人，大陸團則邀請了前《經濟學週報》記者高瑜、前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等六人，俞梅蓀於回國後旋即出席趙紫陽逝世 7 週年家祭，他在趙紫陽靈前向致祭者介紹了在台灣觀選的見聞，在場人士無不為之鼓舞和興奮，慶幸有台灣民主為中國做了示範。孔識仁總結多年舉辦觀選的經驗，乃發出喟嘆，中國大陸祖輩建立而父輩失落的民主憲政夢，此刻正在台灣實現；他認為中國有其本土的憲政傳統，就是中華民國，將中國民主化的正當性基礎建立在中華民國法統，是最能撼動中國民心的論述（孔識仁，2012；

⁸ 如總統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係頒發賀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致贈花籃，只有台聯黨主席黃昆輝公開到場力挺，出席的台灣政治工作者，立委僅有高志鵬，其他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前總統府憲改辦公室主任李俊俤、新社會智庫顧問前立委林濁水，都是民進黨籍。

俞梅蓀，2012）。

2012 年 4 月 19 至 21 日，出於林俊佑的推薦，曾建元受邀前往美國加州長灘（Long Beach）參加公民力量舉辦的第 7 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此行有林啓驊同行，結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海外民運工作者、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各民族自由運動工作者、及各國異議者，從而促成第 8、9 屆兩屆研習營獲得華民的支援而移師台北舉辦，2013 年 4 月的第 8 屆營隊，時香港佔中運動蓄勢待發，民間人權陣線、專上學聯等香港青年領袖多人就近來台參與（曾建元，2012a；施文達，2013）。

三、風雨共撐，台港同行

2013 年 1 月，為配合台灣業務的推展，華民在台灣成立華人民主文化協會，選舉顧忠華為理事長，林佳龍與曾建元為常務理事。當月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關於 2017 年香港人民可以自己決定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的承諾，實現雙普選，而提出非暴力抗爭的施壓構想，戴耀廷徵詢基督教浸信會牧師朱耀明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獲得支持響應，2013 年 3 月 21 日香港 12 個政黨和團體宣布組成真普選聯盟，選出鄭宇碩為召集人，27 日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佔中三子共同發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建議以審議民主方式制定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徐承恩，2017：500）。鑒於香港民間對於非暴力抗爭的認知普遍有限，乃由鄭宇碩規劃由華民邀請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自 6 月起至 2014 年 2 月在香港和台灣舉辦多場非暴力抗爭訓練講習，而以香港民主黨 2 月 22、23 兩日在香港新界沙田區烏溪沙青年新村主辦的非暴力抗爭訓練營結訓（何平，2015：141）。期間尚有 2014 年 1 月 18 至 19 日華民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台北舉辦的「台港公民社會運動」研討會，探討台港公民社會結盟的可行途徑（海芯葆，2018），2 月 5 日，香港民主黨人即由主席何俊仁率領在中環皇后像廣場舉行佔中誓師儀式（馬淑君，2014）。

2014 年 3 月 18 日，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導火線是國民黨籍立委張慶

忠欲藉立法院內政等八委員會聯合審查會議主席地位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交院會存查，引起社運團體島國前進學生衝入立法院區佔領議場，但結構性因素則是國共合作導致兩岸權貴資本主義對台灣產業環境的衝擊。太陽花學運提醒了台灣社會⁹，最終乃成功擋下『服貿協議』，對於香港民運有相當的鼓舞，也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的民主輸出深感忌憚。5月30日，曾建元應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邀請出席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國際研討會》，遭香港政府沒收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禁止入境、於次日遣返回台北（華人民主書院，2014）。

2014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高度自治權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完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效力。6月底，香港有78萬民眾參與民間公民投票，票決真普選聯盟的自由競選案；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成《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特首參選人須獲官派的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限2至3名，立法會選舉則不作變動。結果和《八三一決定》的巨大落差，宣告香港民主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開決裂（徐承恩，2017：500；石黑，2020：125）。

華民邀請了台灣的社運團體利用參加七一大遊行的機會前往香港進行交流，並規劃了6月30日的「港、澳、台社會運動的發展」研討會（華人民主書院，2014）；島國前進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以及東吳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林啟驊，均遭香港拒絕入境（陳競新，2014）。9月22日香港專上學聯發起大學生罷課，26日學民思潮發動中學生罷課、並重新奪取金鐘添馬艦政總公民廣場，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佔中運動登場、自此起為時79

⁹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君愷、哲學系助理教授沈清楷、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吳豐維更發起〈以純真戰勝詭詐，讓太陽照亮黑箱！——大學教師反黑箱服貿罷課聲明〉響應（謝性恩，2014）。

天，又稱為雨傘革命。香港本土意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基本法』關於香港人民雙普選權利的承諾之後全面爆發，反對民主派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路線的勇武派群眾在主張香港民族自決的本土民主前線領導下，於 2016 年大年初一在旺角展開魚蛋革命，本土派以香港民族論和香港自決獨立為訴求，挑戰與反叛民主派 1990 年代以來的民主回歸中華論，後者被本土派謔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石黑，2020：125-30）。2015 年 3 月 15、16 日，台港社運交流平台於台北客家文化會館舉辦了「台港社運交流」研討會，香港的統獨問題竟成了重要焦點（林保華，2015）。

香港最後一波大規模抗爭是反對『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反送中運動，反對香港引渡逃犯至中國大陸，抗爭者甚至一度攻占立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2020 年 6 月由全國人大依愛國者治港原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質沒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石黑，2020：125）。鄭宇碩流亡澳洲、何俊仁下獄，他們都成了被專政的國家敵人甚至囚徒。香港華民公司於 7 月被迫解散。台發會改組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推選曾建元出任，由王興中擔任秘書長，延續華民的精神，繼續傳承台北六四紀念和支持中國民主化的薪火。這一年，中國青年團結會因未能依『政黨法』規定由政治團體轉型為政黨而廢止立案，這一個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基於中華民族主義的支援中國民主化青年團體的結束，意味著以普世價值重建兩岸民間關係的時代無可迴避，必將來臨。

四、歌未央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華民與支聯會於 5 月 18-20 日在台北台大校總區舉辦了「六四事件三十週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研討會，蔡英文總統 5 月 23 日在總統府公開接見了受邀出席研討會的海外中國民運工作者王軍濤、王丹、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人吳仁華、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方政、人道中國主席周鋒鎖、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中國海外民運聯盟秘書長李曉明等，以及台灣人民民主亞洲基金會會長洪哲勝。這是台灣總統史無前例地藉六四紀念

名義公開接見中國民運人士表達對中國民主的支持（陳民峰，2019）。6月3日，蔡英文第二度以六四紀念名義在總統府接見中國民運人士，是由中華港澳之友會安排的海外民運人士認識台灣民主人權參訪團¹⁰；副總統陳建仁更出席了華民主辦的『記憶·抵抗』中國六四屠殺30週年紀念晚會，是台灣歷年出席六四紀念晚會層級最高的政府首長，出席晚會的政治人物，還有陸委會副主委陳明祺、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民進黨祕書長羅文嘉和時代力量主席立委邱顯智（黃宣尹、陳冠穎，2019）。

2022年六四33週年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上豎起了丹麥雕塑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系列作品《恥辱柱》（*Pillar of Shame*）的香港版《國殤之柱》¹¹，民進黨籍立委林靜儀批評國殤之柱是紀念哪一國的國殤，引起社會議論（曾建元，2022）。結果激起在台香港流亡者的同仇敵愾，號召與會，以致廣場人數衝破2,000，是近20年來的最高峰。現場語言國語、閩南語和廣東話交錯，各個人權團體關心的，也不只是中國大陸的六四，還包括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西藏、維吾爾和香港問題，甚至緬甸議題。

六四30年了，台灣人民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鎮壓與強權霸道，而在民族感情上與中國大陸越走越遠，但從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從同為被壓迫者的處境，台灣公民社會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的關懷反而更加堅定，而且成為檢驗各個政黨價值立場的指標。蔡英文能在2020年連任總統，和國民黨韓國瑜面對香港反送中運動閃爍態度的強烈對比有很大的關係（曾建元，2020）。誠如前新黨籍僑選立委老牌中國民運參與者錢達2014年6月1日在日本舉行的民主中國陣線論壇中所言（莊豐嘉，2014）：「雖然我主張統一，但也必須告訴各位，就算有一天，中國也民主化了，台灣是否要跟中國統一，還是必須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同意才行。」台灣和中

¹⁰ 成員包括旅美政論作家陳破空（陳勁松）、吳祚來、澳洲李曉明、齊氏文化基金會理事齊家貞、西澳洲大學政治科學及國際關係學程主任陳杰、墨爾本民運聯盟監事長高健、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暨斯德頓島學院政治和全球事務學系教授夏明、日本《月刊中國》主編鳴霞等（海濤，2019）。

¹¹ 《國殤之柱》當年係為紀念六四而製作，而保存在香港大學，但受『港版國安法』影響，遭香港政府和香港大學移除，所以在台北以立體列印方式透過網路募資重建了縮小版的國殤之柱。

國的關係，應當要超越民族與主權問題的狹隘框架，而要從民主與反民主的視野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聯結，而是否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利，正是檢視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民族感情和價值共識上，重新接近和統合的條件成熟與否的唯一標準。

2018 年 8 月 19 日丹麥中國之路研究會在德國杜塞道夫（Dusseldorf）邀集海外各地反共人士會議，我國有李西潭和前建國黨主席台灣永久和平夥伴協會會長黃千明與會，會議通過《杜塞道夫共識：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維護世界永久和平》，宣告「人民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是聯合國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所揭示的核心價值，我們呼籲中共政權尊重人民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與前途命運的權利」（中國之路國際研討會，2018）。2022 年 4 月 27 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聯合總部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港台藏國際研討會後通過《倫敦共識》，重申「堅決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憲章』，擁護與落實人民／民族自決權的核心價值基礎，我們呼籲中共政權尊重人民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與前途命運的權利」（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聯合總部，2022），9 月 25 日，民聯於澳洲雪梨主辦「中共二十大後的台海局勢暨兩岸關係」研討會，通過《悉尼共識：反專制，反侵略，繫和平》，同樣延續《杜塞道夫共識》和《倫敦共識》的主題，揭櫫「主權在民原則之下的地方自治與住民自決是現代民主與國際準則的基石，也是『聯合國憲章』和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確立的核心價值」；會議關心台海局勢，特別指出「台灣海峽現狀的改變，必須經由不受武力威脅的台灣全體公民投票決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2022）。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至 27 日，海外民運工作者組織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九合一選舉）觀察團來台觀選，27 日，在由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辦事處指導、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協會、華民和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及亞洲公共文化協會聯合舉辦的「台藏踐行民主制度對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的影響」跨國座談會後，通過《台北觀選宣言：中國要民主，台海要和平》，當中強調，「兩岸政治談判的前提，必須尊重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意願：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必須實行民主化，開放言論自由和報禁黨禁，兩岸應當以同樣自由民主的制度作為共同追求和努

力的目標。任何違反民主和自決原則的兩岸間任何政治安排，我們堅決反對！」（巴桑，2022；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九合一選舉）觀察團，2022）經過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長年互動交流，雙方的信念與共識，已經由文字加以簽署確認而可接受檢驗挑戰，而這在中國民運一方，要面對其來自國內的質疑，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黨國意識型態的環境中更顯得難能可貴。

香港人民在爭取真普選的過程中付出慘痛代價，高度自治全面淪喪，說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視角中，只要不接受共產黨的黨國體制統治，就是分離主義、獨立主義，因此爭取中國民主化的鬥爭，在戰略上，一定要將中國人從大一統的中華民族主義迷思中解放出來，正視中國或中華民族其實是源自清末梁啟超、孫中山一代人的政治建構，目的是要將古老的封建帝國轉化為現代主權國家，為立憲政體奠基，而不論是地方自治、聯省自治、聯邦、邦聯式聯邦或甚至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或是將大中華區分為充分自主的七塊地區（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華北、華南）的七塊論主張（李登輝，1999：241）。關於未來中國的民主治理，必然要對當前的中國進行解構，在制度上，要有建國程序和憲政民主體制的規劃；在意識形態和觀念上，則要有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認同分裂的準備，全體華人社會才有機會脫離中華民族主義帝國的心理宰制，成為人格自主獨立的公民、形成公民社會，打造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是『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國，儒家的良知和西方的理性並列為人的稟賦，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社會倫理觀是全球人類秩序和關係的基本規範原則，它們是普世價值的重要成分。『中華民國憲法』早於『世界人權宣言』制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華民國常任代表兼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張彭春在代表中國參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時，將良知與理性並列為人作為人權主體的普遍人格基礎，乃根源於儒家的仁學理念，他還自承參考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人權和基本國策條款，因此由『世界人權宣言』進一步開展的國際人權兩公約，也蘊含著中國儒家的人本精神，將普世價值和中華文化對立看待，是昧於歷史和真理的政治洗腦（Tseng, 2017: 991-93）。由普世價值連結兩岸，同時由『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的實踐經

驗來論證憲政主義在中國的在地化實踐，對中國是具有高度的借鑑作用的。『中華民國憲法』文本是憲政主義在中國本土發展至今的最高歷史成就，本文相信，未來憲政中國的打造，台灣奠基於本土化的民主化經驗和智慧，乃有其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而台灣人在反殖民和爭民主的歷史過程中鍛鍊出來的堅定信念、反抗意志和立憲主義國家，也將會成為鼓舞中國各民族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力量，並且對大漢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帝國如何走向現代民主國家發揮強大的制衡與監督作用。

中國民主化未必能消滅中華民族主義，甚至在選舉動員中，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都可能激發出中華民族主義者對於分離主義的敵意，但民主和寬容的政治文化是需要經過學習和錘鍊的時間過程的，台灣有人因為擔心中華民族主義受到政治煽動而導致兩岸升高對立，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壓政治控制反而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兩岸關係的重建，最終要落實在民間的相互理解和諒解，才能長治久安，而兩岸人民價值共識的基礎，除了普世價值作為架構，難道要自外於全球人類，臣服於權力者的握手言歡，隨時擔心受制於少數決策的失誤而暴衝嗎？一個真正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也必然是一個人本主義者，相信所有的中國人也可以和台灣人一樣全心擁抱普世價值，享有基本人權，做自己和自己國家的主人。

參考文獻

- 丁楚，2009。《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香港：海風出版社。
- 中國之路國際研討會，2018。〈杜塞道夫共識：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禁聞網》8月24日（<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renquan/minyun/20180824/989356.html>）（2023/3/17）。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2022。〈多方團體達成悉尼共識：反專制，反侵略，繫和平〉《大紀元》9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9/27/n13833501.htm>）（2023/3/17）。
-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聯合總部，2022。〈倫敦共識〉《歐洲之聲》4月30日（<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10058>）（2023/3/17）。
- 中國泛藍聯盟，2009。〈中國泛藍聯盟告中國國民黨黨中央書〉《大紀元》7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9/7/26/n2602494.htm>）（2023/3/17）。
- 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九合一選舉）觀察團，2022。〈台北觀選宣言：中國要民主，台海要和平〉《光傳媒》11月28日（<https://ipkmedia.com/180733/>）（2023/3/17）。
- 孔識仁，2009。〈民運領導人組團考察台灣地方選舉心得多（一）〉《博訊》12月5日（http://45.35.61.42/hero/200912/zgmzdlhzb/7_1.shtml）（2023/3/17）。
- 孔識仁，2012。〈再續祖輩建立而父輩失落的民主憲政夢——觀民國101年台灣大選有感〉《大紀元》2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2/13/n3511534.htm>）（2023/3/17）。
- 巴桑，2022。〈台藏踐行民主制度對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的影響跨國座談會在台北舉行〉《西藏之頁——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網》11月29日（<https://xizang-zhiye.org/台藏踐行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影响跨国座谈会在台北举行>）（2023/6/18）。
- 王丹，2012。《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台北：時報文化。
- 王平宇，2006。〈國共唱和，國民黨遺孤心好痛〉《自由時報》4月2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8930>）（2023/3/20）。
- 王炳章，1983。〈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收於《中國之春》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之春文選》，頁29-31。紐約：中國之春雜誌社。
- 王炳章，1984。〈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收於《中國之春》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之春文選》，頁59-71。紐約：中國之春雜誌社。

- 王炳章，1998。《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中國民主化運動百題問答》（民運手冊——一百個民主運動問題對談錄）（<https://www.bannedbook.org/b5/resources/file/5777>）（2023/6/8）。
- 王炳章，2002。〈我與蔣經國總統：中華民國在台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證〉《黃花崗雜誌》2 期，頁 112-18。
- 王寓中，2005。〈連戰坦承，主張聯共制獨〉《自由時報》4 月 30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5155>）（2023/3/20）。
- 王綽中，2006。〈中共披露台灣密件，九二年金援民運人士，國安局付費〉《中國時報》11 月 8 日。
- 石黑，2020。《新香港民族論》。台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 何平，2015。《佔中反思錄》。香港：美加出版有限公司。
- 余杰，2017。《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新北：八旗文化。
- 呂昭隆，2007。〈借重民運登陸，經援 20 年秘辛〉《中時新聞網》9 月 24 日（<https://city.udn.com/54532/2424773>）（2023/3/20）。
- 呂昭隆，2022。〈扁資助王丹 660 萬，遠高於行情價〉《中時新聞網》4 月 11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11000308-260118?chdtv>）（2023/3/20）。
- 李氣虹，2020。〈統獨回看兩國論，蓋棺再論李登輝〉《優傳媒》8 月 3 日（https://umedia.world/news_details.php?n=202008031706496768）（2023/3/20）。
- 李登輝，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事業。
- 李筱峰，2020。〈《二二八前後中國知識人的見證》：長官公署的「奴化論」引起反感且鬧得滿城風雨〉《關鍵評論網》2 月 27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774>）（2023/3/20）。
- 亞衣，2003。〈民主理念的傳播者——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創始人黃雨川先生採訪記〉獨立中文筆會，1 月 26 日（<https://www.chineseopen.org/blog/archives/177737>）（2023/3/20）。
- 林同，1991。〈悼念「探索」創辦人段克文將軍〉《傳記文學》58 卷 4 期，頁 64-66。
- 林佳鴻，2014。《中國大陸海外民主運動發展與挑戰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
- 林保華，2008。〈零八憲章缺住民自決〉《自由時報》12 月 30 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69490>）（2023/3/20）。
- 林保華，2015。〈台港公民社會運動研討會〉《民報》3 月 22 日（<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9bcc0c47-91e9-448d-8d03-55f535e7acfb>）（2023/3/20）。
- 武聞編著，2009。《民運精英大起底》。香港：南天（國際）有限公司。
- 芳呈，1996。〈民運人士赴台觀選〉《北京之春》36 期（beijingspring.com/big5bjs/）

- bjs/bc/36/101.txt) (2023/3/24)。
- 邱燕玲、王寓中、謝文華，2009。〈過去…力挺六四 如今…馬避見王丹〉《自由時報》網 5 月 25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06080>) (2023/3/20)。
- 俞梅蓀，2012。〈魂繫天外，情暖人間——有識之士思趙紫陽〉《新世紀》3 月 13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3/20/n3545671.htm>) (2023/3/20)。
- 姚蘊慧，2012。〈到台灣要看甚麼〉《兩岸公評網》6 月號 (<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467>) (2023/3/20)。
- 施文達，2013。〈美資助「洗腦營」，培訓港「獨青」〉《大公報》6 月 18 日 (<https://www.tkww.hk/epaper/view/newsDetail/1346692074937913344.html>) (2023/3/20)。
- 洪哲勝，1996。〈《台灣新思維》序〉《台美史料中心》3 月 31 日 (<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publi168/>) (2023/3/24)。
- 紅線，2021。〈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簡介〉《自由聖火》1 月 22 日 (<https://fireofliberty.info/clcm/1266/>) (2023/3/20)。
- 倪育賢，1989。〈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博訊》2 月 (http://45.35.61.42/hero/2007/nyx/64_1.shtml) (2023/3/20)。
- 倪育賢，2007。〈中國自由民主黨歷史簡介〉《博訊》7 月 (http://45.35.61.42/hero/2007/nyx/76_1.shtml) (2023/3/20)。
- 晉硯，1999。〈構建大陸民運與台灣的政治合作關係——記魏京生台灣之旅〉《北京之春》2 月 (<http://beijingspring.com/big5bjs/bjs/bc/69/44.txt>) (2023/3/20)。
- 海芯葆，2018。〈「占中」遭「獨」害港，華人民主書院鋪路，「兩獨」合流〉《大公報》9 月 28 日 (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80928/PDF/a2_screen.pdf) (2023/3/20)。
- 海濤，2019。〈台灣總統蔡英文會見大陸異議人士，同求普世價值〉《美國之音》6 月 6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tsai-meets-mainland-dissidents-20190606/4948049.html>) (2023/3/20)。
- 秦晉，2010。〈「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研討會開幕〉《新頭殼》11 月 12 日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1779>) (2023/3/20)。
- 秦晉，2021。《1989-2021：我所經歷的中國海外民運三十年》。台北：新銳文創。
- 翁衍慶，2016。《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台北：新銳文創。
- 馬淑君，2014。〈民主黨誓師佔中遭狙擊，支持電子公投方案〉《獨立媒體》2 月 5 日 (<https://www.inmediahk.net/社運/民主黨誓師佔中遭狙擊-支持電子公投方案>) (2023/3/20)。
- 國民黨青年團，2021。〈那些年我們一起捍衛自由民主〉《國民黨青年團·臉書》6 月 3 日 ([acebook.com/kyoung.tw/posts/3969464073089774/?paipv=0&eav=AfYy](https://www.facebook.com/kyoung.tw/posts/3969464073089774/?paipv=0&eav=AfYy))

- WypDyJByVf42V2QJA2-S1ysQHhMHCGD03qtYSz22uxmkC9i3Blwrr-197_Hflll
&_rdr) (2023/3/20)。
- 國民黨青年團，2021。〈秘密救援行動〉《國民黨青年團·臉書》6月6日 (https://fr-fr.facebook.com/kyoung.tw/posts/3972253226144192/?locale=fr_FR) (2023/3/20)。
- 張祖樺，2018。〈《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前言〉《獨立中文筆會》6月10日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9224>) (2023/3/20)。
- 張達明，2018。《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澳門：三思文商傳訊有限公司。
- 曹長青，2002。〈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收於武聞(編)《民運菁英大起底》，頁 111-13。澳門：南天國際。
- 盛雪、陳奎德，2009。〈尋找共同點——日內瓦漢藏會議：背景及緣起〉獨立中文筆會，11月23日 (http://45.35.61.42/hero/201109/shengxue/4_1.shtml) (2023/3/20)。
- 莊豐嘉，2014。〈談六四，蔡英文敗給馬英九〉《新頭殼》6月5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4-06-05/48007>) (2023/3/20)。
- 許世楷(李明峻、賴郁君譯)，2006。《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玉山社出版。
- 許紀霖，2018。《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香港：三聯書店。
- 許劍虹，2021。〈那些因「民國熱」而誕生的「國粉」們，為什麼在馬英九下台後也跟著消失無蹤？〉《關鍵評論網》2月4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816>) (2023/3/20)。
- 陳力、蘆葦，1994。《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端點星計畫)。紐約：Terminus。
- 陳水扁口述(陳儀深主訪、彭孟濤整理)，2019。《堅持——陳水扁口述歷史回憶錄》。台北：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 陳民峰，2009。〈馬英九緊急整頓「台灣民主基金會」〉《法國國際廣播電台》6月14日 (http://www1.rfi.fr/actucn/articles/114/article_14290.asp) (2023/3/20)。
- 陳民峰，2019。〈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中國民運人士〉《法國國際廣播電台》5月31日 (<https://www.rfi.fr/tw/港澳台/20190531-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中國民運人士>) (2023/3/20)。
- 陳沛郎，2005。〈梁啟超的對內民族策略〉《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期，頁 101-19。
- 陳泱潮，2006。〈陳泱潮在柏林大會上向主講人的友好提問和糾偏發難〉《博訊新聞網》5月15-16日 (https://45.35.61.4/hero/2006/chenyc/13_1.shtml) (2023/3/24)。
- 陳奎德，2006。〈海水泛藍入赤縣〉《北京之春》網 8月11日 (<http://beijingspring>).

- com/c7/xw/wlwz/20060811175508.htm) (2023/3/20)。
- 陳柏年，2009。〈文化對談，精神激盪〉《新紀元周刊》116期，4月9日 (<https://www.epochweekly.com/118/6186g.htm>) (2023/3/24)。
- 陳維健，2022。〈蔣經國與中國民運的史海沉鈎〉《阿波羅》2月5日 (<https://hk.aboluowang.com/2022/0205/1704804.html>) (2023/3/20)。
- 陳競新，2014。〈台灣多元社會參與正處政治拐點的七一遊行〉《東網》7月3日 (https://hk.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40703/bkntw-20140703000420348-0703_04411_001.html) (2023/3/20)。
- 喻智官，2011。《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香港：溯源書社。
- 富權，2010。〈從《北京之春》停刊看馬政府的民運政策〉《新華澳報》10月23日 (<https://www.waou.com.mo/2010/10/23/從《北京之春》停刊看馬政府的民運政策/>) (2023/3/20)。
- 曾建元，2002。《一九九零年代台灣憲政改革之研究——民族主義與民主轉型的觀點》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曾建元，2003。〈民主台灣之旅紀實〉收於曾建元（編）《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頁467-504。台北：唐山出版社。
- 曾建元，2007。〈我參加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屆年會〉《台灣法律網》3月30日 (<https://www.lawtw.com/archives/357399>) (2023/3/20)。
- 曾建元，2012。〈但開風氣不為師，客家老大邱榮舉〉《大紀元》2月11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2/2/11/n3509744.htm>) (2023/3/20)。
- 曾建元，2012。〈讓我們同在一起——出席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有感〉《議報》7月3日 (<https://yibaochina.com/?p=235037>) (2023/3/20)。
- 曾建元，2013。〈民主進步黨執政經驗反思——台海兩岸關係的解構與重構〉《民主中國》8月13日 (<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35204>) (2023/3/24)。
- 曾建元，2019。〈六四與台灣——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民報》7月1日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dd29da9b-7520-46b1-8cd6-5f565c13dd0c>) (2023/3/24)。
- 曾建元，2019。〈台灣制憲與中國制憲——啓蒙與歷史的辯證〉《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5卷3期，頁141-69。
- 曾建元，2020。〈問是誰家天下：中國的政治整合模式〉收於施正鋒（編）《政治整合的模式》，頁223-62。台北：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學會。
- 曾建元，2020年。〈香港反送中對台灣大選的影響〉《民傳媒》1月28日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1b220bdf-741a-43a8-b3c8-c1f9d536f7b8>) (2023/6/17)。
- 曾建元，2022。〈全世界被壓迫者團結起來——關於恥辱柱台灣重建眾籌計畫的聲明〉

- 《議報》4 月 15 日 (<https://yibaochina.com/?p=245780>) (2023/3/20)。
- 曾建元、楊明勳，2015。〈丘逢甲的憲政思想與建國事功〉《台灣國際法季刊》12 卷 2 期，頁 71-100。
- 曾建元、楊雨亭，2019。〈台灣人誰在關心中國——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統獨認同變遷：專訪楊雨亭〉《公民議報》9 月 19 日 (<https://theintellectual.net/zh/famous-column/judicial-reform-tax-reform/2180-201938f.html>) (2023/3/20)。
- 華人民主書院，2014。〈「港台民主、風雨同行」——華人民主書院聲明〉。香港：華人民主書院。
- 黃宣尹、陳冠穎，2019。〈六四 30／陳建仁：盼民主在中國茁壯〉《YAHOO 網》6 月 4 日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六四_30-陳建仁-盼民主在中國茁壯-131019752.html) (2023/3/20)。
- 黃瑞珍，顏柯夫（口述），2021。〈流著自由的血液，六四運動者顏柯夫：「有一種鳥被關在籠子裡，牠會撞到死為止。」〉《太報》6 月 4 日 (<https://www.taisounds.com/People/Story/uid4593713974>) (2023/3/20)。
- 楊孟瑜，2006。〈民運人士欲入國民黨「無法」如願〉《BBC 中文網》2 月 20 日 (http://wwwnews.live.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4730000/newsid_4732100/4732164.stm) (2023/3/20)。
- 維靈，2013。〈泛藍聯盟成員孫不二刑滿獲釋〉《自由亞洲電台》12 月 27 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sun-12272013094948.html>) (2023/3/20)。
- 趙晶來，2008。〈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將在台召開〉《看中國》4 月 8 日 (<https://m.secrechina.com/news/b5/2007/11/17/amp218776.html>) (2023/3/20)。
- 劉志聰，2008。〈評析陳雲林訪台對台灣社會的裂解效應〉《新世紀智庫論壇》44 期，頁 95-97。
- 劉勝驥，1984。〈王炳章和「中國之春」運動〉《問題與研究》23 卷 9 期，頁 82-93。
- 劉蕙苓，1989。〈陪他們走過台灣——訪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側記〉《遠見》1 月 15 日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152>) (2023/3/20)。
- 慶正，2010。〈中國民主化會議，挺劉曉波〉《旺報》11 月 1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01113000951-260303?chdtv>) (2023/3/20)。
- 鄭大行，2020。〈唐元雋泅泳至大膽島尋求政治庇護金門地檢署偵查終結做出不起訴處分〉《金門日報》11 月 16 日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10239/?cprint=pt>) (2023/3/20)。
- 鄭欽仁，2019。《中國現狀與歷史問題》。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鄭源，2017。〈王炳章博士早期海外政治活動簡述〉《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1

- 月 7 日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7011807.htm>) (2023/3/20)。
- 鄭源，2022，《才命奉獻民主路》。紐約：昆侖出版社。
- 薛忠義，2004。〈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憲政思想探析〉《鞍山師範學院學報》6 卷 3 期，頁 1-6。
- 薛偉，2020。〈沉痛悼念洪哲勝先生〉《北京之春》12 月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500/1227202060016.htm>) (2023/3/20)。
- 謝文華、曾韋禎，2009。〈台灣聲援，燭光遙祭歷史傷口〉《自由時報》6 月 4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08553>) (2023/3/20)。
- 謝性恩，2014。〈5 大學教師發起連署反黑箱服貿〉《中時新聞網》3 月 24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24003711-260509?chdtv>) (2023/3/20)。
- 鍾元，2013。〈台灣立法院通過人權提案援救中國 16 良心犯〉《台灣大紀元時報》11 月 13 日 (<https://groups.google.com/g/qx01/c/Dh1VEvOL34Y>) (2023/3/20)。
- 顏振凱，2022。〈自爆以國務機要費支持中國民運！陳水扁透露：分 2 年給王丹 20 萬美元〉《新新聞》4 月 7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4276736>) (2023/3/20)。
- 嚴家祺，2021。《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台北：太山文化傳播。
- Breton, Raymond. 1996.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 English Canada and Quebec," in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 *Ethnicity*, pp. 348-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ie. 2019.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ssessing China's Only Open Political Opposi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Lamounier, Bolivar, 2002.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Joseph S. Tulchin, and Amelia Brown, eds,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equality*. pp. 1-10.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seng, Chien yuan. 2017. "Human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Asian Valu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 No. 2, pp. 989-99.
- Wang, Chi. 2011. *A Compelling Journey from Peking to Washington: Building a New Life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U.S.-China Policy Foundation.
- Yu, Wen Long. 2021. *Social Movements in Great China- Five Poiso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sinau: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Taiwan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 Taiwanese Activist's Perspective

Chien-Yuan Tseng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aiwanese nationalism is one of important political dynamics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which means oppos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Han chauvinism.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cannot avoid the issu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terms of value. Taiwanese nationalism used to be puzzl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Kuomintang, but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s made them willing to support China's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niversal values. They also hope that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y can help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to rediscover Taiwa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as also learned to respect multiculturalism in its contact with Taiwan, so as to reflect on their position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in the face of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ies' freedom movement. From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lose observation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verseas Taiwa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how to further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iwan's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n create a new imagi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s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universal values